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293期

### 目录

#### 【思想文化】

梁启超谈爱国

黎澍谈红色遗产

红波缘何再次来？/唐燕

#### 【百年中国】

军人 女人 糖衣炮弹

——我军性事面面观/刘家驹

还剩下多少右派没改正？/姜学斋

冤死夹边沟——关于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赵旭

#### 【域外见闻】

我眼中的新加坡（3）

——新加坡的教育/于向真

#### 【知行】

我有一个银色的梦/吴蓓

#### 【述往】

周扬女儿的回忆：苦难人生十二年（二）（1968—1972.4）

——文革中期，下放苦练/周密

#### 【访谈】

李春光口述：怀疑一切 /文靖 采访 整理

#### 【文摘】

1978，真舍不得你走

——党报旧闻与高层旧事/祝华新

关于“狼奶”教育的社会学想像/郭于华

#### 【本刊声明】

## 【思想文化】

**梁启超谈爱国**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说：“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中国人接受的教育是：爱国就等于热爱共产党及其领袖，爱国就等于听党的话。党国意识形态严重地扭曲了政府和民众对“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的认识。祖国就是祖国，政府就是政府，二者不是一回事。政府有优劣之分，而祖国永远是美丽的。爱国和爱政府不能划等号。党和政府也不能划等号，党更不能和国家划等号。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认同，一个国家之所以值得认同，乃是因为它维护公民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使他们的集体存在有尊严（人权）、有道德目的（正义）、并符合他们认可的公正程序（法治、公正的政治代表机制）。因此，公民的爱国并不表现在一味地顺从国家权力，而在于要求和督促国家权力不要破坏公民群体所共同珍惜的东西，尤其是人的尊严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民主价值。假使一个国家罔顾这样的诉求，那么便不再值得去爱。■

**黎澍谈红色遗产**

“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这正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反修”是教条主义已达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就僵得连弯都转不过来。直到文革，我们连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不问所犯何罪，也是罪该万死。什么“走资派”，何罪？问了几年，没有一个人能答得出来。随便抓人，关人，打人；侵犯人身自由。谁非法，谁犯罪？那时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大

家都处于愚昧状态。有了愚昧，就有教条主义，就有个人崇拜，就受人利用，任人宰割。文革中的红卫兵手捧《语录》，口喊“万岁！万万岁！”到处去“破四旧”。你看，这不是一幅饱含讽刺意味的画面吗？……自己脑子已经旧得够可以了，而破的都是形式上的东西。☞

【思想文化】

## 红波缘何再次来？

唐 燕

近年来，翻开报纸、收看电视新闻或者点击百度，显耀位置总被一人占据；各单位又被组织学习贯彻最高指示；领导人深入基层、关怀民情的报道又轮番上演；颂扬领袖“天地诗心”广博文化的赞歌又被唱响；今年新兵入伍教唱的歌曲竟是“做x主席的好战士”；前几天12月1日，教育部在官网发通知：

全国普通高校推送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就业，并将列入考评重要内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老歌再次响起！身为50后的我，对这一切太熟悉了。

2018年秋天我从外面回到北京，原来曾参加过街道活动的我，迅速被街道干部们动员参加歌咏大赛，告知“参加者获赠一套红军军服和八角帽，还发大米和油。”我马上谢绝了。十年前我刚退休，曾积极为街道活动出谋划策，提议并认真写出方案的有手工艺交流赛、家庭废品再利用、老人常见病应对知识讲座等，街道先后都采纳了，街坊邻居们热情很高，皆大欢喜。这些年变调了，最基层的街道也重拾红色党文化，我只能说声对不起，急流勇退。

2019年春节前，我单位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上，有人向出版社领导提建议：“抓紧时间组织力量，出版歌颂主席的儿童读物，让孩子们从小热爱……”言辞恳切，马上有人随声附和。这些老新闻工作者不再年少轻狂，却依然沉迷领袖崇拜，以为紧追太阳才是政治正确。哎，红色文化披着华美的外衣，用世界大同、按需分配的终极平等取代生而平等和程序正义，到头来美梦联翩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一地鸡毛。

“中国人民站起来”后没几年，我国出兵帮金家跟联合国军打仗，公私合营剥夺私人产业，反右剿灭精英，大跃进饿死千万同胞，文革刨祖坟毁掉道德根基，改革单腿蹦经济腾飞的同时道德滑坡贪腐横行……2012年中纪委领衔打贪官，许多上年纪的人重温1966批斗走资派的激情，“艰辛探索”取代了“十年浩劫”，文革红卫兵、插队知青被“无悔青春”诱惑煽情，强人一统催生宪法修改，改开唯一成果被抛弃的“领导人终身制”满血复活，红色文化再掀新高潮。

红色文化卷土重来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合理性、必然性呢？很遗憾，真的没有。我个人的体会主要有两条：

①公平公正是多数人发自内心的追求，贪图享受好逸恶劳是普遍的人性。人们对现实不满，幻想被伟人带领改变；憎恨又羡慕巧取豪夺的权贵们，看不到维护尊严的途径，严重缺乏安全感，最稳妥的只有跟着强人亦步亦趋。

②六十多年的言论与思想严控，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探求真相、真理的信念，丧失了追求公平正义的勇气，一些砖家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顶礼膜拜或鹦鹉学舌或充当刁盘侠，多数人假装沉睡故作迷信，沉溺于随波逐流脑部缺氧的岁月静好中。而广大民众苦于生计庸于围墙，被一边倒的媒体忽悠，在美妙前景蛊惑下不得不忍受现实的罪虐与不公。

如今我们正面对急速跨入全球化的新时代，进步与后退不仅考验咱中国人，也让全人类因分化对立而焦灼不安，比如一个多月来美选大剧之跌宕起伏实在令人眼花缭乱。写到这里想起120多年前一件事：

面对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的支持，亚当斯曾对一名英国记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最终会发现，假如大多数人失去控制，他们和不受约束的暴君一样会变得专制残暴。

人类历史从不讲公平到呼唤公平，从实现形式上的公平到追求实质公平，方向是明确的，道路又是极其曲折的，我们不仅要自己带头反思，也要鼓励亲友们学会反思，拒绝让我们的后代再一次经受苦难，拒绝让国家再一次走入漫长的黑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的任务！

手里没选票，逆行无目标，冲出怪圈去，诀别红思潮！

【百年中国】

## 军人 女人 糖衣炮弹

——我军性事面面观

刘家驹

1949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城市的社会秩序由12军实施军事管制。

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山城的风貌依然花团锦簇，香风习习。从山沟沟里走来的老军们，一见重庆的女娃儿标致，心荡神摇，物欲泛起，纷纷打发了小脚的、不识字的、脸上有皱纹的老妻，换得年轻貌美有文化的新妇。一时间，老干携少妻，双双出入商店、戏院、公园、餐馆，其乐融融。老百姓厌恶当今的陈世美，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最为恼怒。他认为，抛弃糟糠之妻的干部是思想堕落、作风腐化，是资产阶级的俘虏。他把城市比作大染缸，把城里的女人比作糖衣炮弹。为了“防糖弹、拒腐蚀”，他抓住了“张、唐事件”做典型，向全区干部敲响了警钟。

—

“张、唐事件”的张，是张柯岗，12军宣传部部长；唐是唐平铸，12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把自己的小脚老婆换成随军名记者曾克，唐把没文化的发妻休了，娶了个大学生。他俩都是军队的高级政工干部，邓拿张、唐开刀示众对全军最具有震慑力。与此同时，12军还有48位师团级干部给老婆换了届，都遭到了同样严厉的惩治。

12军召开党委扩大会批斗张、唐二人，批斗会上，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这首歌是张柯岗写的词，时乐蒙谱的曲，批判者哼罢，指着张柯岗问：歌词是不是你自己在批判自己，柯岗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已的爱情观念。

当时，老军们对自己的婚姻离异，就像在撤换战斗不力的部属，无须通过法律的诉求，仅向上一级的组织部门备个案，然后给女方所在的区、乡、县政府发封函，凭借军队的大章和本人职务，没人敢站出来说不。

最不服气的是张柯岗，我是他的部属，见面就发牢骚，说毛泽东不要贺子珍，找了江青，连组织手续都没有。邓小平找的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女儿，成分那么高，自己批准自己，我们为什么就该当刀头肉？

张柯岗的不满遭到了邓小平更为严厉的处置——脱下他的军装，打发到重庆市文联爬格子。

邓小平还把“张、唐事件”提到了巩固政权的高度。他责令军区所属的文工团队，大演《李自成进京》以教育部队。这出戏的剧情来自郭沫若一家之言的《甲申三百年祭》，说闯王率大顺军攻进北京，不为江山为美人，因为死活爱上了陈圆圆，把刚到手的新政权很快丢失。今人考证，说李自成的失败是因为一场鼠疫使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

当初邓的目的是借古喻今告诫部队，要是像李自成一样为女人而败落，就会退回太行山打游击。在他的倡导下，由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学习运动，从600万人民解放军中清理出数以千计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我记得，我们的一位副师长持不同“政”见，在一次批判会上放声大骂：怎么怪糖衣炮弹呢？都是你偷鸡摸狗的，管不住自己的鸡巴，瞎戳乱戳，自作自受！

## 二

无情的斗争是我军教育人的一贯方式。我参加过好几次反腐的批斗会。那时，我刚从军干校毕业，分配到师野战医院当文化教员，教导员很器重我，每次党支部开会批斗“腐化”干部，都要扩大我参加做记录。在我的记忆里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次批斗，是一对男女护士暗恋引发的（当时团级以上干部、年满28岁才有资格恋爱结婚，他俩都是副连待遇）。一天晚上，他俩在护理值班室幽会，关了灯，一群好事捉奸的“志愿者”待机破门而入。亮灯一看，只见他俩在床沿上正襟危坐，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床上动作。

捉奸的都是些老资格，绝不愿无功而退，为了取证，不由分说把女护士摁

在床上，扒掉裤子，脱下裤衩，把裤衩拿到批斗会上用手电筒照着给大家展示。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老护士还喊着：“大家都好好看看，裤衩上有块精斑！”是真是假谁也无法判定。此时，与会的群情激昂，口号声起，高呼：“要老实交代！”“回头是岸！”“不交代滑不过去！”上台批判的人无不破口大骂：“不要脸！”“丢人！”“破鞋！”……

我的心灵震颤了，他俩的命运很可能是开除军籍、党籍或是降级降职（护士降下来做护理员）。幸运的是，掌握政策的教导员手下留情，别看他主持会批的调门高，处分却很轻，俩人都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防糖弹”教育，在全军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人人都感到自危。医院的女同胞多，我和她们都熟识，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从不单独和她们中的谁多说几句，若有事要交谈，也一定要找个正直的党员陪着做见证。我处处注意监督男女作风的积极分子，她们都和我的关系不错，经常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女同胞中的种种风流轶闻，如谁有主了，谁正待字闺中等待组织分配，谁曾因腐化受过什么处分，有多少干部住院是来“点秋香”的……

战斗部队对男女之事的严格管理更是严格，授受不亲成了他们的戒律。我调到总政之后，文革结束，信访处老李给我讲了他正着手处理的一件怪事：一对来总政上访的中年男女，早年是同乡、同学，抗日战争又一起参军，入伍后天各一方，1951年在北京重逢，相约到颐和园一游，两人正坐在树下叙旧，过来两名北京市军管会的执勤士兵，将他俩带走，经军事法庭审讯，认定他俩坐在树荫下有说有笑是作风不正，一直收押到文革才结束。他俩的申诉说，凭什么关我们20多年？青春年华谁来弥补？总政领导批示，发回原单位处理。原单位只能恢复他俩副连级，可他们的战友已是师团职务了，而他俩的命运是复员回乡务农。

在城市，霓虹灯下的哨兵们拒绝女人身上散发的香气，硬要说成是资产阶级腐蚀军人的毒雾。执勤战士要是多看了女人几眼，在晚上的班务会上，准会受到大家的严厉批评。重庆街头有个战士巡逻，见一对男女勾腰搭背，他端枪上去用刺刀扒拉开两人依偎的身躯，还骂人家是资产阶级的腐化作风！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所在的12军入朝参战，“性”闹开始国际化。

杀鸡儆猴是我军最令人生畏的纪律处分。比如，我们进入朝鲜作战之前，一个在国内解放战争中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连长，因对女房东强奸未遂，在万人誓师大会上当众枪毙。入朝行军，部队大都宿住朝鲜人家里，凡是对朝鲜妇女动手动脚的，一律就地处决。我还参与破获过一起案件，一个工兵连连长来住院，趁月黑风高，奸杀了我们的一个护士。临刑前，警卫连的战士让他自己挖好坑，要他躺下试试长短宽窄，问他合不合适，枪毙时，让他跪在坑边，排长用20响点着他脑袋说：记住，二世为好人。枪响，脑浆像散花一样迸出，排长一脚把他蹬进坑里。

军纪严酷无情，却难以制服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在朝鲜作战一年，常和朝鲜群众朝夕相处，饮食男女之事屡屡发生。军法不再用杀人警示，把犯罪一词也更名为生活作风错误，处罚他们通常是放到机关的挑夫班、师的担架连、团的运输队，以苦力代刑罚。当兵三年，老母猪当貂蝉。军人的性饥渴无法抑制，全军腐化已逾千人（有的是班、排集体作业），法罚更难责众，凡属通奸的，都交给本单位组织和行政酌处。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失利，我们是一支有5万人的军，伤亡近半，很快从四川补来两万翻身农民，我们这些入伍已两年又经历战争考验的学生兵，从机关、后勤抽调到连队充当战斗骨干，我到炮团山炮连任见习排长。

团长是用大刀片子杀出来的红军干部，他的外号叫老锤子，人正直无私，就是满口脏话，念念不忘女人。入朝前，因抛弃老妻把他从副师长降下来的，新婚的女孩惧怕战争，别他而去。团长三天两头向组织科要女人，组织科从医院给他找来个护理员小纪。小纪是重庆人，和我一起参军的。开初，组织科找她，以入党提干为饵，她一听说团长是犯错误的，又没文化，年纪已47岁，怎么也不答应，师政委动了大驾，左劝右说，要她工农化，压服了小纪，小纪提出交换条件，不干护理，政委马上拍板，调炮团当民运干事。

婚后的小纪，心情不快，见我就数落团长，说他动作粗野，张口就骂人，在全团大会上讲话都带性，什么屌鸡巴、操他娘之类的。团长还有个特点，开党委会也要讲荤故事。他讲的都会在全团流传，其中有一个故事流传最广——

抗日战争中，他已是连长，他们连的卫生员，喜欢给住地的大闺女、小媳

妇看病，总说人家下身发臭是长了蛆。姑娘们不谙事，吓的要求他给治病，他要女孩子把裤子脱了，说能把蛆掏出来，然后他也脱了裤子，拔出他的宝贝就径直往里捅，捅了一阵，拔出来给女孩子看，我已经给你把蛆捣烂了。这事让小媳妇知道了，人家都懂，有人报给了村妇女主任，妇女主任要大家抓骗子。她们逮住卫生员，也扒下他的裤子，妇女主任找来把剪刀，正准备剪下他的宝贝，村长知道了，赶来制止，妇女们仍气不过，找来几条麻绳，把卫生员的小鸡子系上，提溜着送到了连里。故事有挑逗性，成了大家经久不衰的龙门阵。

#### 四

我在炮兵连还兼任团支部的副书记（支部书记是副指导员，他是党支部分工的青年委员）团支部经常要处理几个小鸡子不老实的人。

我们连的驾驶员都是专业的，给他们组成了驾驶班，便于生活和思想的管理。班长是党员，没有驾车的技能，他手下有五个兵，都是从俘虏国民党兵中挑选出来的，在档案上称为解放战士，党的组织很难吸收他们，只发展了两名团员。他们日常生活自由散漫，经常出差拉物资弹药，一出去就是三五天，沿途都住宿朝鲜老乡家。朝鲜人家的青壮男人大都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就守家种地，我们这帮驾驶兵就乘虚而入（在朝鲜几乎所有的志愿军汽车兵都深知此道），他们先从车上取下些食品或日用小百货之类的，送给房东青年妇女博得欢心，仅一夜间就能得手。

驾驶班每次出勤在外，班长负责捉奸，回来就报给副指导员，副指导员通常交给我处理。最初，我们把犯事的捆起来批斗，不认账的就吊在树上逼供，批判者说到激愤时，还允许他上去挥动拳脚。后来师团明令禁止体罚，我们也不再捆绑打人。但批判如何严，处理如何宽，都由我掌握。如驾驶员小罗，屡抓屡犯，斗得他成了块橡皮，大家气不过，一致要开除他的团籍，我坚持留团察看，开除人举手就通过，可人家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的宽容出现了成效，回国后处理他复员，我送他去车站，临别时，小罗流下了泪。他家在蚌埠，1967年我到安徽“支左”，专程去拜访他，他已是一家千人大厂的党委副书记，作为革命干部最先解放出来主持工作，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夫人是厂的制图员，热情贤惠，我们两人对往事都羞于提起，我感

悟的是，用恩义焕发出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回报社会。

我当时的心境虽然是组织性高于一切，但对待这帮人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爱恨交织，多了几分人情。

我们连的炊事员小陈，四川人，团员，是翻身农民参军的，他的女房东是朝鲜人民军排长的妻子，我们发现女房东的肚子大了，才知道是小陈搞的。我找小陈谈话，他认错，诚恳的表示，愿意接受团组织的任何处分，他要求我千万让女人把孩子生下来，复员了，他会来接他们到四川去。他天真又荒诞的愿望，我在批斗会上给截留了，讲开了对他极为不利。他犯的事，不但涉及朝鲜地方，还牵动朝鲜人民军，必须会同双方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处理。我到团机关找到小纪，她是民运干事，是专和地方打交道的。

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朝鲜人家的炕上，也是她夫妇睡觉的地方，团长也在，正坐在炕上抽烟，满屋烟气，他一见我就骂：“你们的破屌事，天天找上门，干脆把朝鲜女人都弄回四川慢慢搞去。”

“四川人怎么啦？四川人得罪你啦！我不是给你搞了吗！”小纪肝火陡地升起，以团长惯用的粗话反击。团长不敢反抗，灰溜溜地走开了，这是全团他唯一惧怕的人。

我在电话里已给小纪汇报过小陈的事，她让我坐下来，说，“按师的规定，搞一个朝鲜妇女应赔偿300斤高粱米，可人家肚子里的也是人啊？我看应给600斤。再就是一一定要让那个朝鲜女人离开你们住地，回她娘家去，一则是避开了小陈，也免得你们连的人闲言碎语。我还要去找里（村）委员长，不能让她回去后受到当地群众的歧视。”

我告诉小纪：“小陈一直惦记着孩子下地，怎么办？”

小纪说：“小陈像个男人，还有点情义，孩子生出来，他是带不走的。这事我去做工作，你回去要帮助小陈放下包袱，还要告诉你们连里，再增加200斤高粱米，一共800斤，就说给女的搬家用的。”

小纪的安排具体周到，我感到小纪成熟了，更感谢她对小陈的怜悯。我回到连，如数把800斤高粱米送到里委员会。

大约三个月后，小纪打电话来，要我再带些吃的去慰问那个妇女。小纪说：“她已生了个男孩，她的丈夫不要她了，当地政府对她不好，不给口粮配给。”

我向指导员做了汇报，把小纪说的都说成是团长说的。

第二天，我用车拉上500斤高粱米和200斤大米，还有几箱罐头和副食，跑了50多公里，到了她娘家住的村子见了她，见了孩子。孩子未足月，已没有奶水，靠吃苞米糊糊，瘦瘦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女人脸清瘦，灰色，显得忧郁，有气无力地向我哭诉，说乡亲们疏远了她，骂她，政府不管，吃的粮食少，要配些薯叶和苞米茎。她要求见小陈一面，让小陈看看孩子，她不知该怎么生活。我无法回答她，只是安慰她一阵，亲了一下“中朝友谊的结晶”就走了。回来的路上，心里沉沉的，我一直在想，战争给了她的痛苦，男人又增添了她的痛苦。如今，亲人们又让她痛不欲生，她已面临生死存亡，谁还能说她是颗糖衣炮弹呢！

我还要说一件司务长老冯的“异事”：他是山西人，老婆来信告诉他，说梦见他回家了，她已怀了孕。他拿着信给我看，问：你说说，我媳妇做个梦就肚子大了，这事可能吗？我不能跟他较真，他脾气躁，只对他说，可能，古时候，老子他妈就是做梦才有了老子的，给中国生出了大圣人。老冯听了半信半疑。过了几个月，她媳妇来信报喜说，生啦，是个男孩。老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管他妈谁的种，只要叫爸爸就行。

## 五

战争让女人走开，我们还用刺刀剥离了女人的爱。

这事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在我们和美二师对峙的日子里，营的兽医老丁留在后方看管牲口，有时，他跟随牲口送弹药来到我们连的阵地看望我，会亲热地聊上一阵。他知识面宽，懂英语，我们和美俘聊天，他当翻译，朝鲜话也流利，我们之间很有交情。

留守处离阵地不到30公里，他来阵地请示或办事，只需大半天的路程，他却要走上三四天。有人发现了他的秘密，在他的路途中，有户朝鲜母女，女儿是江原道（省）文工团的团员，老丁一来二去，都要在她家歇歇脚。女文工团员很有魅力，吸引了老丁，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十天半月就相会。这事被营长知道了，把老丁臭骂了一顿，处理他却很难，老丁是起义军官，不是党员，即使撤了职，全营几十匹牲口的伤病谁来料理？女文工团员也知道老丁触动了红

线，她是见过世面的女人，竟只身跑去见了我们的师政委，斗胆地提出，她爱老丁至死不渝，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这连彭德怀总司令都不会答应的问题，终不能如她所愿。

年底，我军换防，在撤出阵地之前，营长把我找去交代，要我带一个班，提前把老丁押到后方休整地再作处理。我到了留守处，收缴了老丁佩戴的手枪可尔特，这是我在战场上拾得送给他的，并通知他，部队马上转移，明天一早你跟随我先出发。老丁明白是领导的用意，坦然说，我不会违反纪律，更不会叛变革命，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和她见一面。我同情老丁，在友情和纪律之间，当然坚守我的职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劝你还是死了你的心吧，我不可能放走你。

其实，我心中有数，那女人能量大，可能有了我们即将离开的信息。

入夜，那女文工团员果然来了，哨兵堵住了她，班长来向我报告，我思量再三，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不能把事做绝，应给他网开一面。我告诉班长，要哨兵放行，一切责任由我来担承。最担心的是怕发生意外，我要全班通宵达旦地在全村巡视。

战争改变了人的常态，恐惧会使人精神分裂，善良的会变得暴戾，有人自伤，有人逃逸，有人报复。我还想起在医院批斗的那两位护士入朝一上战场，就双双投向了敌人的营垒。这一夜，我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大早，老丁拎着背包来了，他脸色灰黄，两眼红红的，显得十分疲惫，他俩相拥一夜，也许山盟海誓，做过种种抉择，我感到莫大欣慰的是，他终于回到我们的队列。我赶紧让战士把他的行装放到牲口驮上，给他一张热乎乎的大饼和一壶水，他没有接，没有言语，只迈动他沉重的双腿。一路上，他耷拉着头行军，宿营任他独处，一日三餐，按病号饭做好给他送去。一天晚上，他刚睡下，我给他端去一盆洗脚水，还帮他挑了脚上的水泡，涂上了碘酒，他绷紧的脸上松弛了，还出现了一丝笑意，我看到开导他的机会来了。我说：“老丁，我就睡在这里吧，说说话。”他没拒绝。

我躺下来，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却先敞开了心扉，像一股拥塞已久的山泉开始奔泻。

“刘老弟，”这是他对我的尊称，“你才20岁，我在你这个年纪已混闯江

湖，参加过青帮、贩过烟土、开过赌场。我有家传的兽医本事，胡宗南天下第一军炮团聘我当了兽医主任。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有的是难兄难弟，我的为人义气第一，谁犯了法，我给包住；动刀动枪打群架的，都听我调停；要开小差，我给出路费；有人要报复，我会帮助他杀人。老弟啊，我的事，我想通了，你仅是拦阻我的一张铁丝网，我不会责怪你，也不会伤害你，你还有明天，阴功积德，胜造七级浮屠，你别以为我是旧军人旧意识，人藏在心里的正气都是一样的。”

这番话，我听得心都快跳出胸膛。他有丰富的世俗经历，人生哲学却是反动的，我崇信党的教育，我的纯正受到挑战，已无法和他殊途同归，我气的无语以对。

到了谷山休整地，他很快被遣送回国。一去茫茫无消息，人消失了，他的爱也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我渐渐走出阶级斗争的围城，念及老丁，生发出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情。

我们的营长在处理老丁事件时，很像圣人。回国后他进了高级炮校深造，新婚夫人是个大学生，她常带同学来家坐坐，营长心花了，看中了一位谈吐不俗的女孩子，不断让妻子送书给她看，送着送着，书里夹上示爱的字条。有一次，夫人在无意中拆开了包书皮，发现了纸条，忽如晴天霹雳，她闹到校党委，学校交给了原部队处理。营长毕业归队，当副团长的任命搁下了。我私下对他有个结论：“糖衣炮弹是营长自己引爆的！”

## 六

军队男女艳事，红军时期就有轶闻。

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书记×××，被怀疑是 AB 团的主要成员，遭到保卫局的关押审讯。此时，刚上任湘赣军区司令和赣西南特委两人合谋，要在书记老婆身上寻欢一回。他俩翻墙进屋，书记的老婆不乐意，他俩硬是扒光她的衣服，轮流采花。书记解脱回来，闻听此事，不要老婆了，老婆闹到临时中央，中央找来犯事的两人协商，用抓阄决定女人的归属，最后由特委委员抓到。这是组织抓阄的保卫局长记下的一则日记。

还有，某司令的秘书告诉我，在解放战争中，该司令率领的纵队在中原某

县稍事休整，司令有一双慧眼，看中地主房东秀色可餐的女儿，白天眉来眼去，夜里爬上绣楼和她睡在一起。警卫员急了，报告给政委，政委跑到楼下仰着脖子叫阵，骂司令败坏军纪，司令正在兴头上，不睬不理，政委要警卫员搬走梯子，司令气呼呼地从楼上跳下来骂他：“你当政委的，就会管我的屁事！”

文革开始，军区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司令的家，把他藏在马桶里的避孕套抄出展览，有一千多只。

## 七

邓小平最讨厌自己部下搞女人，在他心底早就埋下一颗记恨的种子。他的第一任老婆金维映，就是给李维汉搞走的。1933年，邓在中央苏区任中心县委书记，国民党打进来，他溜了号，丢了两座县城，中央党务委员兼书记李维汉组织大会小会，批判邓的逃跑主义，撤了他的职，下放到农村薅秧搭谷子。李见金维映守空房，机会难得，跑去和金睡在一个被窝里。一天，妇女干部危秀英去找金办事，一推门见她正和李维汉赤条条的在床上翻滚，吓得她一身是汗，跑出来找到蔡畅，蔡是苏区的妇女部长，她马上封住了危秀英的嘴，要她千万别再声张，说出去坏了党的名声。李维汉是中央领导，金维映是县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在胡搞，会在苏区造成爆炸性新闻。危秀英一直隐忍了几十年，直到邓去世，一位邓的传记作者采访她时，才说了这个故事。

1952年，邓调到中央出任组织部部长后，在处理高干们的腐化事件上，更能说明他的心境。

曾率领我军驰骋中原的另一位司令，故事更为传奇。该司令一生爱枪、爱马、爱女人，他收藏的十多支小手枪，大都是德意日军工生产的精品；他从红军时期当连长起，就从战场缴获中挑选骏马，一匹阿拉伯的纯种马，从鄂豫皖一直伴随他走到大西南；他爱的女人也数不清，我是从多年跟随他的人那里记下了他几则花花故事。

1948年10月，他带领5个旅逐鹿中原，攻打襄樊，他先夺城后攻山，歼敌两万，活捉了国民党15绥靖司令康泽。

在炮火隆隆声中，他不忘亲近女人。进城后部队还在肃清残敌，诸事要他亲自处理，他却放手交给了参谋长，自己带上作战处长过江到樊城去听人说书。

他慕名的说书女人，很有几分姿色，嘴也巧，让司令入了迷。处长几次催他回去，他要处长给他买来烧饼，一直听到太阳落山，把他爱慕之情释放完了，才返回驻地。

他回师路过河南信阳，当地的豫剧团慰问部队，司令看中了三个俏美的女演员，坚持要她们参军。剧团团长死活不干，哀求司令高抬贵手，说，我的百十人的生存就靠这几根台柱子支撑，你们把人弄走了，我的一个团就散架了，老总啊，要钱我们给，人是我们的命，不能带走啊！后来，政委杜义德出面干预才罢休。

1949年10月，进驻湖北沙市，准备向大西南进军，一天，司令把他属下的军师两级干部召到一起，不是开会，而是要他们去逛窑子。30多位高干们一听都傻了眼，咧开了嘴。司令说了就得照办，谁敢不遵？

沙市有条窑子街，现代人叫红灯区，那时记者对这种行业称之为“无烟工业”。做窑户的人家门前都挂有一盏红灯笼做标志，老嫖客一眼就能从灯笼的大小式样分辨出它的等级。当司令领着一大群军队的高干来到这条已经冷落多时的街道时，行人都停下来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共产党的老总们，以为他们是来“扫黄打非”的。

司令领头，每到一窑户的门前，他一脚踹开房门，然后指着跟来的一位师干说，你进去。他又走到第二家踢门，又呼叫×××，你进去。再到第三家踢开门说，该你了。几十家窑户都安排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两级的将领。进去的人，绝不是蜻蜓点水的应付了事，他们都得坐下来和窑姐攀谈，问问这，说说那，谁也不会上床试水，他们都有共同的担心，从窑户出来要面对王司令的考问，答不上答不好，都要受到训斥。

司令站在大街中央，他等待诸将出来说说心得体会，来一个就问一个，怎么样？领教了吗？

回答是各式各样的，绝没有一个正儿八经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之类的大词，谁要是把见到的女人说的俏皮逗人，表述得荤荤的，司令最爱听。

自从淮海渡江战役之后，我们这帮老总们，从未有这么轻松过，有人说，女人是战争的润滑剂，司令也许是在性饥渴中找到的一种释放方式。



此时此刻，不近女人的邓小平，正在郑州发表声东击西的演说，告诉胡宗南，刘邓大军入川要翻越秦岭。

司令进四川后，暗恋刚从国军接收过来的京剧团演员玉翠蓉。每到礼拜天就要这位演员到他家洗澡。他让警卫员把水烧好，支上脚盆（四川人洗澡用的大木盆）倒上热水，玉翠蓉在里边洗浴，司令在外边通过门缝往里窥视。警卫员火了，踢盆打墙地乱叫（那些年，警卫员很有党性，敢在党的小组会上批评首长的作风）。司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欣赏而已。后来他当了公安部副部长，权势炙人，性天地宽阔，两年间搞了几十个女人，最终发配到河南的一家农场看管苹果园。

战友的指责，严厉的处分，没有让司令放弃他的爱，他把年轻的保姆带到了农场。文革前，把他改良品种的苹果拉了几卡车上北京，让老部下给他推销，在小保姆的陪伴下，走家串户，谈笑风生，毫无赧颜，他像永远生活在春天里。

## 八

战争年代，对一般干部性的管制，只能是严防死守，对老军们，则是建立些有效的调解机制。

部队一停下来休整，组织科的第一要务，是让家属连马不停蹄地赶到休整地，稍有怠慢，老军们就骂娘，老子大头没掉，小头就得享受。

所谓家属连，不属部队的建制序列，它是由组织科把师团干部的家属编成班、排，进行集体管理，安全，有警卫排保护，吃、住、行，由后勤配大车，配粮配物，还有医护人员随同治疗伤病或接生。部队来来回回地在中原拉锯，她们就尾随大军流动，全部身心都是为自己男人的性服务。

有一回，部队在滑县休整，家属连因洪水受阻，一个团参谋长的老婆只身先到，她是坐老乡的筏子过河徒步来的，参谋长不在，正下部队检查工作。几个团干心生妒意，商量，你等不及要先上炕，我们先治治你的骚货。几个人把她诓到一间屋里，扒下她的裤子，露出“骚货”，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壶冷水，直往她阴户里灌进去，每人轮流，嘴里还念说：我来敬你一壶。直到壶水灌完，几个老总像得到快感样的享受，才兴高采烈地撒手而去。参谋长回来怒火中烧，向师党委状告，师长说：谁教你老婆抢先到，人家高兴玩玩嘛，又没有用扁桶，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对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仗的干部，领导恩宠有加，性的管理更是松劲，甚至是放纵。如某团苟团长就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性自由，他主张不娶老婆，他说，老命一丢，留下孤儿寡母的不如自由自在地快活。他在中原战场进进出出16个县，都能找到女人陪他上炕。干部们编出歌谣：苟团长，老扁长，村村都有丈母娘。

当我军跨过世纪之门，什么“糖弹”“走资派”都成了历史，性已是现代军人公开的生活情趣。

斗转星移，到了文革时期，几十万军队干部管治全国的机关学校企业，处处是芳草，权力寻春，唾手可得，宾馆、饭店、招待所成了逍遥宫，有人玩起过五关斩六将的游戏，有人的小蜜以打计算，性交往如同握手般容易。2008年，国内一家著名的社会杂志，与时俱进，倡导“快速性交”。

如今我已是垂老之年，无法去展望明天我军的“性”事了。☞

## 【百年中国】

### 还剩下多少右派没改正？

姜学斋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划出了五十五万右派，80年改正了多少？扩大化程度如何？坊间与学界有不同的说法。

坊间有只保留了五个（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和只保留了96个的不同说法。前者无须细数，后者如前不久微信上流传的“千赞研究院”（2019-09-17）的统计数字：“根据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未获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国家记忆：五十余场运动翻腾而过》1949-1977）。

在2011年以前，关于没有改正的右派，官方的说法有三种，一种是一万一千余人，一种是五千人，一种是三千余人。

一万一千余人的说法，最早出自金春明。《历史决议》下达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金春明在一个内部报告里中说：“根据复查结果，当时全国定了五十五万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复查平反了98%多一点，剩下不到2%，大约全国有一万多右派。这一万多还不是纯粹的右派，这里有‘双料货’：有的是历史反革命或有其它历史问题，又有一点反动言论，就划为右派了。可说真正的右派比这个数还要少。”金春明做这个报告的时间应该在1983年至1984年，这个报告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打印件上有“内部材料”的字样。

五千人的说法最早来自李维汉。他在《回忆与研究》中提到：“现在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中，已改正的五十四万余人（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人，而且还在陆续甄别。”（下册，84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一版）

丛进在1989年出版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份子552877人。到1980共改正了54万余人（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余下的5000人，是维持原案不改和尚须陆续甄别的。可见扩大化程度之严重。”（6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显而易见，丛进的说法来自李维汉。

三千余人的说法来自萧冬连。他在《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一书中说：“到1981年上半年……全国共改正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9%。对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公职，另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余人，以及受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全国维持右派的有3000余人。”（115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2008）作者有一页下注：“《统战历史》，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萧的书是在香港出的，不应该算是官方出版物。但他的资料来源是统战部网站。所以这个数字还是应该看做官方的数字。只是，他的这一条注释没有注明查阅时间表，有违学术规范。

2011年，在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上册中，在谈到反右的地方有一个很长的注释：“1978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报告，其中提出凡是不应划为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予改正。根据这个精神，全国对55万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基本上作了改正。198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对复查、改正的情况做了说明。属于改正的人大体上有三种情况：（1）一部分人出于善意，提出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2）一部分人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但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

（3）还有一些人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考虑到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也考虑到他们后来确有改变，因此改正的面是很大的，占55万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98%以上。《报告》强调“其中有些人是属于可改正可不改正的”，而“本着从宽的精神予以改正”。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被划为右派的代表性较大的上层爱国人士27人复查的结果，改正22人，维持原案5人；对维持原案的人，也肯定他们同共产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457页，注2，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时至2013年，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胡治安在《回忆“摘帽办”：解决55万人的问题》中说：“到1980年底，全国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尚有1万余人在复查中。随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得到了改正。”（《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3期）胡治安所说的“2%的右派分子没有改正”，55万的2%就是一万一千多人。他又说“尚有1万余人在复查中。随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得到了改正。”那么改了多少，剩下多少，是剩下了5个，还是96个，不得而知。

综上，关于没改正的右派的人数，是一笔糊涂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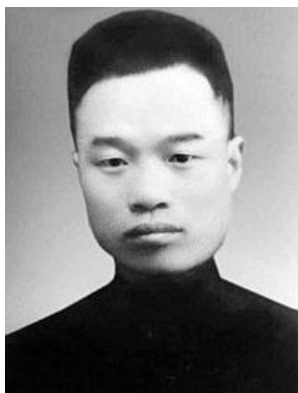
地方志和地方史上的有关记载，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含糊不清，据邢野、宿梓枢主编的《内蒙古文化大革命通志》记载，内蒙古原“河套行政区（1954年设制，时辖五原、临河、安北、狼山、达拉特后旗、杭锦后旗、陕坝镇。1958年7月撤销，辖区并入巴彦淖尔盟）共划右派分子632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590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6页，香港，中国科学教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出版社出版，2005）

【百年中国】

## 冤死夹边沟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

赵旭



这些年来网络上关于傅作恭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些夹边沟的幸存者也以讹传讹，让笔者采访时也曾进入过误区。笔者为了对历史负责，多年来采访了与傅作恭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在夹边沟农场一起劳教的幸存者及其亲友，并且查阅了傅作恭的档案，于2014年在台湾出版的《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对一些不实的说法进行了纠正，但时至今日仍然在微信群里流传傅作恭是傅作义的胞弟、美国留学生，从事水利工作，偷吃猪食死在猪圈门口等等一些不实的报道，现对此加以更正。

### 一、读书与家庭关系

傅作恭，字静之，男，汉族，山西省荣和县（现临猗县）第三区（孙吉镇）安昌村人，生于农历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傅作恭的祖父傅文鼎育有两子，傅庆泰和傅庆玉，两兄弟一共有十个儿子，依次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为他们取名，其中傅作仁、傅作义和傅作良为傅庆泰之子，包括傅作恭在内的其余七个为傅庆玉之子。所以，傅作恭是傅作义的堂弟，而不是胞弟。傅作恭的父亲傅庆玉（子崑），继母傅张氏。

傅作恭1926年即开始在私塾读书，1927年至1935年6月在山西省荣河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学习毕业，其中曾与七哥傅作良和侄子傅正印到山西省太原学习。1935年至1938年6月在天津南开中学初中部毕业。他的《自传》中写道：“我梦想将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日寇天天在学校附近打靶演习，打破了我的梦。日寇在租界内的横行无忌激起了我的侠义爱国热情，于‘一二九’

运动中，我冒着敌人的刺刀、水龙头、大刀、机关枪，冲破了敌人全副武装的弹压队及铁丝网在日租界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并列在火车路上卧轨、派代表请愿，这是我向恶势力斗争的第一次。”1938年至1940年6月，傅作恭在重庆南开中学高中部毕业。后因贫血病在家休学一段时间。1940年至1941年在金堂铭医中学习毕业。1941年至1945年5月傅作恭在成都的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毕业（抗日战争时南京金陵大学迁到了成都的华西坝。傅作恭和笔者的父亲是同届校友，傅作恭没有留学的经历，也没有从事过水利工作，是一位严谨求实的林业专家。）傅作恭毕业后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他任绥远临河奋斗学校农场副主任。1946年11月至1949年6月又任绥远狼山绥西军耕农场副场长（场长为武善立）兼绥远临河奋斗学校农场副主任、奋斗学校名誉校长。1949年8月至1950年2月傅作恭任绥远省立第二农事试验场场长。1950年3月至1950年7月任绥远省立林业试验场场长。

傅作恭从小既无生母抚养，继母对其经常虐待，而其父则不闻不问，使其心灵受到了很大创伤，这是他以后性格孤僻、脾气暴躁的主要原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他家中45口人，三院房屋、土地三百余亩、木船22个、商号五所。1939年8月，抗日战争时因傅作义为抗日名将，其家被日寇轰炸焚毁，木船、房屋均被烧掉，片瓦无存，全家逃难陕西省西安市，家境穷困，靠做买卖维持生计。他的大哥傅作仁（叔伯哥哥），管理家中全部财产，傅作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傅璞，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在23兵团任少将教官；二儿子傅琬，黄埔军校第十九期毕业，曾在23兵团司令部任少校参谋。傅作恭的二哥傅作义（叔伯哥哥），抗日名将，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有两个儿子；女儿傅冬菊西南联大毕业，共产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越南做地下工作，特长法文，任《人民日报》编辑兼外勤记者。三哥傅作礼，从小耳朵聋了，未念过书，在家闲住。四哥傅作信，日本帝国工业大学毕业，曾任北京石景山炼铁厂总工程师。七哥傅作良，延安抗日大学毕业，曾任23兵团司令部中校团长。十弟为傅作让。傅作恭与傅作义虽是叔伯兄弟，但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从小都和睦相处似亲兄弟一般。

## 二、参加工作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前夕，傅作恭曾多次劝说董其武等走北平和平之路，指出“那是最光明的一条路”，并参加了后来的绥远和平起义。

1952年4月傅作恭在绥远凉城县请长假从绥远到西安看望父亲，又去北京看望二哥傅作义。在这里他遇到了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邓宝珊。1952年6月经邓宝珊介绍到甘肃省农林厅林业局工作，并于1953年至1956年10月一直任林业局造林科科长。家住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街（西街）17号。

1956年肃反运动傅作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肃反运动后期甘肃省农林厅对傅作恭历史问题结论为：“傅作恭同志的问题，经查证，刘满苍（因牧羊垦兵武占元偷了绥远狼山绥西军耕农场的羊卖给刘满苍）证明傅作恭打了他的耳光，但没有打他的父亲，刘仲元（刘满苍之父）是以后因病而去世的。傅作恭原先的手枪问题，经刘明证明是经王锡端出售属实。至于脱离绥远凉城县工作，系请准长假脱离的。”

据傅作恭档案记载：1957年5月29日农林厅召开民主党派成员座谈会，傅作恭说：“现在对知识分子重用不够，改造多，重用少”。并且在平时闲谈时说过：“把人分成中间、落后形成拉拢一批，打击一批，工资改革对你们所谓的积极分子的提高，所谓的落后分子的打击，统战政策是上统下战，下面战而不统，墙和沟是共产党造成的，把旧社会过来的人一律另眼看待，对旧知识分子的重用一笔勾销。”“局里有坏蛋（指党员积极分子），不赶出去工作搞不好，逢迎拍马，想升官发财，看领导眼色行事，顺风倒，加入党是为做官，一朝权在手，就把命令行，汇报时加油加醋，这次整风为什么还叫这些人来领导呢？”“他妈的，还没鸣哩，现在就压开了，你们整党哩，还是整我哩？”“不做工作，不犯错误，否则将来坐班房还不知道为的啥。”由于这些言论反右运动中傅作恭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押送到甘肃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 三、夹边沟劳改

傅作恭去夹边沟农场时，家中有妻子潘翠竹和五个孩子傅锦蓉、傅锦国、傅锦民、傅锦科、还有一个刚出生满月的孩子。傅作恭去夹边沟时他最大的女儿傅锦蓉14岁，当时在兰州五中上学，由于家中没有了收入经济无着只好退学。1960年傅作恭的妻子潘翠竹带着五个孩子被迫回了老家农村山西省临猗县南赵

公社安昌村，凭亲友接济到处借债生活。傅作恭的妻儿回老家山西安昌村时，最小的老五刚满月，老五后来在贫病交加中13岁夭折。由于傅作恭的右派问题孩子们被株连不能升学、入团、参军、参加工作，妻子潘翠竹忙了外面忙家里，里里外外一把手，负债累累，劳积成了驼背凹胸。

傅作恭在任甘肃省农林厅林业局造林科科长（行政十五级）农林工程师（三级工程师）时，具体负责甘肃省的植树造林工作。傅作恭在个人检查中说道：

“我是一个技术干部，我到西北来就是想为绿化西北尽自己一个螺丝钉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尽一份力量”。他经常深入到甘肃河西走廊、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陇南林场一线进行植树造林的指导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兰州市中山桥北面的白塔山光山秃岭，与兰州南山的五泉山形成鲜明对照，五泉山上郁郁葱葱，而白塔山却满目荒山、树木稀少。在和科研人员一起反复研究调研的基础上，利用黄河水在白塔山上植树造林，在兰州南北两山挖沟植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然而傅作恭这么一个正在事业上蒸蒸日上的科技工作者和踏实肯干的领导干部却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审查，1956年10月被免去了甘肃省农林厅林业局造林科科长职务。1956年12月30日甘肃省农林厅林业局做出结论意见为：“一般历史问题”。1957年7月27日经甘肃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被划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劳动教养，1958年3月被押送到夹边沟农场，于1960年5月死于夹边沟，尸体被草草埋在了夹边沟农场的毛夹山后。

林业局退休高级工程师金昨非告诉笔者，他生于1931年，1954年在山东农学院林学系毕业，毕业后分到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在农村工作部时他与傅作恭经常打交道，傅作恭对工作的严谨认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他被调到了造林科工作。

初到夹边沟农场时，傅作恭由于有管理农场和林场的经验，给农场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农场采纳他的意见后，不论植树造林和农业生产都有了很大起色。可他耿直的性格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很快引起了场里那些虚报浮夸领导的反感，因为他的建议和科学态度与大跃进胡报乱吹和急躁蛮干破坏生态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另外，这样一个国民党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右派就是反动派的年代里自然就成了这些人莫名其妙仇视的对象。档案中记载：当年傅作



恭在农场时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是“优点：一、性情耿直，忠诚坦白，从来不说一句谎话。二、对坏人坏事恨之入骨，能和坏人坏事做坚决的斗争。三、能遵守场内一切规定和制度。四、简朴节约，能体验出劳动人民生活。五、在学习方面，开会时发言，爱看报纸，注意时事。六、有以场为家的思想，能对场干部和工人提出技术方面改进意见和合理建议。缺点：一、劳动力不强（一个文弱书生，而且38岁的他当时在夹边沟农场属于年纪比较大的劳教人员，身体自然不如别人），不主动。二、没有涵养，性情粗暴爱和人争吵。三、联系群众不够，性情孤独。四、爱受人恭维，不爱受人批评、指责。”

他在夹边沟农场1958年7月12日的检查中写道：“当被批准劳动教养之时，林业局党组曾征求我的意见，愿意自谋生活也可以，而我觉得这是两条道路之斗争，我应当跟着共产党走，所以党总书记刘德珍同志很满意的，再三表示，家中生活完全由党负责，两个月后，并把家给我送来，我提出我素来体弱多病，恐对劳动力太强之工作不堪胜任，刘书记再三表示，可以把体质太差之情况，向此间组织反映，可给予喂猪、养羊之轻劳动，我到场后编入基建队（夹边沟农场基建队是强劳队，一般将所谓不听话的劳教人员和极右分子在这里改造），我之情绪很不正常，觉得力不胜任，每日疲乏不堪，虽尽最大之努力，而同志们之意见非常之多。……”

由于傅作恭耿直的性格，自己有丰富的林业知识和管理农场、林场的经验，看到夹边沟农场无法无天、违反科学的做法他就要说，对农场胡干蛮干摧残劳教人员身体的做法很有意见，这就给自己埋下了杀生之祸的隐患。我采访了傅作恭当年所在小组的小组长孙绍斌和与他在一个严管队里的罗舒群，以及当年农场的管教朱照南，还有司继才、张开丽、王忠毅、刘而森等人，当我默默地听他们诉说当年傅作恭被人用草绳套在脖子上像牲口一样拽拉，被绳子捆、戴手铐、罚扣饭、扇耳光，我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了出来，我哽咽着再也无法进行采访了。夹边沟农场这个人间地狱要让一个人死非常容易，随便找一个借口，就会将你折磨死的。夹边沟农场档案中记载：“傅作恭1959年9月逃跑一次”，“1959年11月19日逃跑一次”，“傅作恭1960年3月5日，打人两次，无悔改，罚戴手铐三天”，“傅作恭将平田整地的搬沙填海运动、抬袋子打擂台和迎接国庆节十周年大干苦战乱发怨气说成为疲劳挣扎”。夹边沟农场领导将他

发配到新添墩作业站基建队劳动改造，这是一个改造右派分子的强劳队。在这里身体好的人都被累垮了身体，何况他是一个浑身有病的病人。

在将沙山搬掉、平田整地的搬沙填海的三个月里夹边沟就死了一百多人，那时傅作恭就晕倒了多次。因为，傅作恭劳动太老实，性格也太倔强，整天埋着头干活不说话，劳动强度太大，傅作恭又是个大饭量，经常饿着肚子。接着是1960年的春天，挖袋子、抬袋子又开始了。新添墩作业站要将芦苇沼泽地里的根泥挖出来晒干后烧成灰了当肥料，这叫挖袋子。而将根泥块装在筐中抬，称为抬袋子。那时一般每筐装四块草袋子，人们一擦就是七八筐，用人工抬到地里，也有用拖拉机拉的，在地里先擦起来，等风干后再用火来烧。当时，新添墩分队长管教赵来苟唆使小队长胡家颖用芨芨草拧搓的草绳挽个套子，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前拽后推，刚走两步，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过了一会逐渐苏醒过来，由两人架着拖到场里。

傅作恭所在小队1959年时小队长为孙木章。档案里说他“当众破口大骂小队长是大坏蛋，小组长是男盗女娼，没有人性是牲口。”在傅作恭夹边沟农场小队组里的鉴定材料中这样写道：“傅作恭对所犯错误无丝毫认识，畏罪潜逃，拒绝改造，抗拒劳动，破坏生产和各项运动，开口骂人，动手行凶，不满社会主义，坚决仇视我党，死不悔改。”“傅作恭于1959年11月19日晚下两点钟逃跑，随身带包袱三个，其中小包袱两个大包袱一个，跑到途中我捉住后，将三个包袱送给小队长孙木章，并将发生的情况汇报给小队长。

上述都所属实

旁证人：马守义

1959年12月3日”

（关于傅作恭的几次逃跑，据我采访当时与傅作恭一起的孙绍斌和另外一些人，他们告诉我傅作恭当时准备要跑，队里已有察觉，事先在他身边安排了卧底，欲擒故纵故意让傅作恭跑，然后派马守义在半道将其抓获的。）

那个时候场里反复说谁劳动好，就给谁摘帽子，谁就可以先释放回家与老婆娃娃团聚。所以，人们就拼命表现，积极争取早日走出夹边沟。抬袋子打擂台，每隔二百米路分一节，两个人抬上七八个擦起的满筐跑过去，放下，再把

上一节的空筐转回来。这种打擂台，哪一节若慢了，袋子就被倒在地下堆起来。堆积了袋子抬得慢了的人，收工后就要被扣饭，而且还要继续干完。而张干事有意识的把身体弱的犯人分到后节，后面的路长一些。当时，傅作恭被分在第三节。那么大的个子每天只吃一个小饼，况且已被连续扣了三天的饭，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有一天，傅作恭晕倒在了一棵沙枣树的旁边，赵振忠队长过去问道：“傅作恭你怎么了？”傅作恭说：“我抬不动了，我饿了三天了。”那天下工后，傅作恭已走不成路了。司继才赶快叫来了劳改农场时留下来的段照熙大夫让他给傅作恭进行了抢救。赵振忠队长让四个人送傅作恭，由于新添墩作业站离夹边沟医务所有很大一段路程，于是每两个人抬一根扁担，一根扁担上放傅作恭一个胳膊，傅作恭是被架到医务所的。

1960年5月份傅作恭病危连夜从新添墩作业站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场部医务所，这个医务所人们称其为医院，因当时这里劳教人员由于饥饿和强体力消耗已经人满为患，根本没有了住院放病人的地方，于是将傅作恭送到了离医务所较近的夹边沟农场场部农业队三队，与刘而森住在了一起。刘而森和王俊峰是夹边沟农场抽出来专门埋死人的。傅作恭临死时就在这个农业队三队宿舍里进行抢救，没有抢救过来，死后是劳教人员刘而森和王俊峰将其埋到了夹边沟农场场部跟前的毛夹山后面。1961年夹边沟农场迫于上面的压力给每一个死去的劳教人员编了一份死亡报告，傅作恭的死亡报告也被匆匆忙忙编写出来放进了档案袋。

### 傅作恭死亡报告

傅作恭，男，38岁，山西省人，于1960年5月患病死亡。患者在58年去场时自诉有肺结核、脱肛史，平时经常腹泻，曾经以健胃收敛剂治疗，并休息及轮劳照顾。自59年冬身体逐渐消瘦，曾昏倒一次，急救清醒后给予休息和治疗，病情有好转。

于60年5月发生严重腹泻，即入病室修养治疗，患者伴有咳嗽、气喘、体质瘦弱、心音弱，心动缓慢，给予营养、强心剂、健胃收敛剂及抗痨药物，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后回队休养治疗。在60年基本未参加劳动。患者虽经常内服营养剂，但体质逐渐消瘦、衰弱。59年11月11日患者私自外出，

发生昏迷，经发现后即大力抢救，但终因病情严重，急剧恶化，抢救无效而停止呼吸。

死亡诊断：急性心力衰竭（埋葬本场山后）

主治医师：陈造堂

勘验机关：酒泉人民检察院

1961年11月8日（盖章：中国共产党地方国营酒泉夹边沟农场支部委员会）

（这是傅作恭档案里的一封夹边沟农场在傅作恭死亡一年多后的死亡报告，这样的报告夹边沟农场其后给每一个死亡的人员编了一份，一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和寻亲的家属，二是留作档案证明死亡的合理、农场的仁至义尽。但从这份报告所说1959年11月11日就抢救无效而停止呼吸，1960年5月怎么再能够发生严重腹泻，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急急忙忙草草编造时的素质和无耻。）”

1979年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 and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经甘肃省林业局党组1979年2月10日会议研究，傅作恭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按干部正常死亡处理了善后工作。☑

## 【域外见闻】

### 我眼中的新加坡（3）

#### ——新加坡的教育

于向真

来新加坡几年，多次听当地人感叹：“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人。”可不是吗，国土面积仅724公里的小岛国，除570万人没有其他资源啊，难怪新加坡政府几十年如一日注重精英教育，努力保证每个国民都受到最好的教育。

我没来之前就对新加坡的教育怀有好感，2011年，儿子儿媳告知“打算要

个孩子”时，我随即建议他俩去新加坡打工，原因很单纯，新加坡被公认有亚洲最优质的教育和安全良好的环境。半年后儿媳只身赴坡，随后儿子也离京到坡，从最普通的程序员做起，安家立业，如今小孙已经4岁多。2015年至今，我们老两口三次南下帮助带孙，眼见新加坡教育之优越超乎先前预期。

几年间遇见过多个专门来新加坡求学的小留学生，孩子健康快乐，而陪读妈妈们真不容易，既要忍受两地分居又需负担不菲的学费加房租，她们追求的无非是这里卓越的教育环境。

### 友好贴心的养娃天堂

2018年初，我家小孙一岁多，儿媳开始物色幼儿园，我也跟着看过几处，感觉都还不错，儿媳好中求好，换了一家公司上班，新单位附近有所优质幼儿园属于协办单位，公司员工子女入托每月可减免800新元。一岁半的小孙很快入托了，最初两天小孙有些恋家，迅速适应，小2班十多个小孩有三位老师，一位新加坡华族英语老师、一位来自台湾的华语老师，还有一位马来族老师。台湾来的潘老师特别温和善，孩子们都喜欢她，我孙第三天就笑着入园了。如今我去接孙，孙多次嘱我“奶奶明天你晚点来，让我多玩会儿。”这话让我开心，可以想见孩子在幼儿园有多快乐。

新加坡有完善的教育体制，双语教育已经推行几十年，幼儿园和小学都有英语、华语、马来语老师，各族孩子同班相处，从呀呀学语时就开始掌握双语或多语。我孙三岁半时，就开始担任我们老两口的翻译，中英两种语言切换自如。

新加坡政府为缓解人口老龄化、鼓励生育，设有奖励金额：公民生第一个孩子可获津贴2.1万新元（约10.5万人民币），逐个递增，第五个及后面的孩子每次可获3.5万新元。据世界NGO组织的报告，近几年新加坡保持着“最适合儿童成长国家”美誉，2019年在176个参赛国中，新加坡位列第一，排名超越了普遍认为儿童福利最好的北欧三国瑞典、芬兰、挪威，亚洲挤入前十的国家只有新加坡和韩国。

新加坡对儿童的保护和教育细致到位，各种儿童设施齐全，硬件设施超级“儿童友好”，各大商场每一层和邻里中心都很方便找到母婴室，母婴室里设

施齐全，尿布台、冲奶粉的冷热饮水机和有隔帘的哺乳软椅。

公共场所如图书馆上下楼梯都有双排扶手，高的适合成年人，低的适合儿童。说起图书馆，只有北京五环内面积的小坡，至少拥有 26 个公共图书馆。周末我们经常带孙去淡滨尼社区图书馆，门口有还书用的自动行走机器人，馆内藏书超多，凉爽舒适，每次可免费带走借阅 22 本书，一个月到期前手机会受到还书通知，点击即可办延期，爱看书的大人孩子在这里好有福！

由于连续 17 年没发生过一起儿童拐卖，新加坡的父母少操很多心，稍微大些的孩子独自下楼玩耍无须担心。一年前网上调查，多数家长表示孩子 10 岁，也就是小学四年级就可以自己上下学了。我住的院子里，离学校稍远的小学生或坐校车或乘公交，学校离家近的都是步行。我看见小学生们基本都是自己或结伴上下学，校门口接送的家长少之又少，跟在北京见到的幼儿园和学校门前爷爷奶奶拥堵着，或父母接孩子的车队排成串的场景大相径庭。

2019 年看到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让自家刚满 3 岁的小娃独自出门去买早餐，为确保安全，全程有人悄悄尾随，娃不知道，自己搭电梯、过马路、点餐、还钱（买单）、提着盒子回家。孩子妈妈看录像时激动得落泪，为自家孩子骄傲。北上广的亲友，您敢吗？

## 基础教育与分流利弊

新加坡的基础教育是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和初级学院两年。12 年里重大考试共有五次，依次为小四分流、小六会考、中二分源、O 水准考试和 A 水准考试，与中国高考“独木桥”的考试制度明显不同。五次和一次相比，升学压力因分散、分流而减轻。一卷定终身太残酷，引发过多少无奈悲叹：寒窗苦读十二载，一生命运被短短三天和几张试卷无情锁定，一次高考成绩就能体现真实水平与综合能力吗？

新加坡中小学课程为半日制，我家紧邻一所小学，邻家小学生每天早晨 7 点半上课，下午 1 点半放学，没有课外作业。学生在校午餐，“学校的饭好吃吗？”同楼邻居三年级男孩闵昊回答我“很好吃”！他妈妈对我说：“学生营养餐每人每顿家长只需交 1 元，其他由政府买单。肉类只提供鱼和鸡，因为马来穆斯林禁食猪肉，印度餐禁食牛肉。”

新加坡中小学 7:30 举行升旗礼、唱国歌，然后上课。课程设置科目丰富，主课是英文、数学、母语专业课，副课有体育、音乐、美术、阅读、艺术、手工、社会研究和健康等，3 年级开始增加涵盖范围很广的科学课，因富含趣味而广受欢迎。各项课程中都包含对情谊、生活技能和社交技能的培养，以及未成年人的情绪管理。

分流制度从小学开始，三年级期末考试后，按成绩将学生分为三类，重新分校分班。很多人批评这么早对学生分流，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自信心，教育部门解释这么做可以将认知不同的学生分别施教，营造出适合不同学习能力的合理环境。许多事有得有失，新加坡这么做或许是高一层级的另一种公平。据说新加坡政府对所有学生全程监控，确保每一个可塑之才都能获得重点栽培。

2002 年，新加坡作家梁智强制作了一部电影《小孩不笨》，用几名慢班学生的遭遇控诉了分流教育的弊端，引起不小的反响，促使政府作出反思，从 2004 年起推行小学教育改革，逐步将快班和中班生源合并，到 2008 年，快班、中班和慢班生源的分流制度被全面废除，只是成绩拔尖的学生分流到名校的制度被保留下来。小学阶段的期末考试多数也被取消，改用以平时积分做评估，切实减轻了小学生和家长的的思想压力。在没有绝对公平的情况下，纠错机制就显得格外宝贵。

新加坡的中学分自治中学、政府中学和自主中学三种。自治和政府中学的学费统一由教育部规定，自主中学自定学费，一般会贵些。中学生选读 7-9 门课程参加毕业文凭考试，另外体育、公民教育两科和课外活动是不需要考试的必修课。4 到 6 年后，根据中学毕业成绩和课外活动的特长加分申报高校。高校分高级中学、初级学院和理工学院，半数以上的中学生进入高等教育中心（相当大专），有 5 所理工学院、3 所工艺教育学院可供选择，其后成绩优秀的少数毕业生有机会最终进入名牌大学。

新加坡大学预备课程教育中心分理科与文科两种，但理科学生必须修读文科科目，文科学生也必须修读理科科目。两三年后学生将参加剑桥高级文凭考试，取得剑桥高级证书者可进入大学。

新加坡教育部门在每次考试中都悉心选拔出一批“精英”，然后加以分流，多元化教育模式结果是考试竞争虽激烈，但每个学生能获得适合自己下一步深

造的路线与机会。优秀的理工学院学生依靠自己的努力，击败初级学院的竞争对手，最终被世界名校录取的例子屡见不鲜。分流形式有消解升学压力的效能，有利呵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心态。

### 精彩免费的课外活动

新加坡小学校放假时间与中国不同，中国学校放寒暑假，暑假长近两个月；新加坡每年6月和12月各放一个月长假，3月和9月各放10天短假。新加坡中小学实行“半天制”，“半天制”让学生从单一课堂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的支配权，有充分时间参与精彩纷呈的课外活动。假期和下午放学后，学校为学生提供上百种不需要额外支付费用的艺术活动，让孩子在实践中挖掘兴趣并建立自信，每掌握一项技能都被加分计入毕业成绩。

为“逼”着孩子玩，学校经常组织比赛，定期举办文艺汇演，这类活动不仅帮学生发挥出潜能，而且能培养协同合作的社交能力，为日后升学的综合成绩提供必要的加分。必读课程之外有了上百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覆盖了能力不同、兴趣各异的学生，这些课外兴趣班是免费的，孩子们根据兴趣选择参加，家长无需再交费，对国家对小家都有益处。

兴趣活动展现出各自的长处，针对具有体育、艺术等特长的学生，新加坡教育部创办了新型学校，因主科成绩低迷而沮丧自卑的学生最适合进入这类学校，便于发挥特长恢复自信，重新定义成功，梦想成真的事例举不胜举。在新型学校中，有人熟练掌握了一门技艺，有人提升了擅长的口才，有人勤于思考学会了创意策划，这些实干型人才国家都需要，人才济济构成健康完整的社会。精英教育优先将高分学霸保送进名校，同时为所有学生提供多样化的竞争性选择，从强调学科学到关注软技能，新加坡教育有板有眼、不急不躁、舒缓自如地协助更多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这正是我要给新加坡教育体制加分之处：全体学生循序渐进地发展自己独特的天赋和兴趣，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开发学生的潜能，重点放在培育学生的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新加坡的教育自成一体，成效显著，难怪新加坡的学生这么猛，时不时在国际大赛上拿个大奖啥的回来。



## 精英教育与重奖优秀

新加坡教育体制沿用了英国方式，也吸取东西文化的精华，在东南亚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目前47%的新加坡国民拥有大学文凭。新加坡的大学学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样，需3年获得普通学士学位，获得荣誉学位通常需要4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是岛上两所最知名的高校，不仅在东南亚首屈一指，在全球顶级大学中也排名靠前。

新加坡重视教育，从政府出资发放的数额可观的奖学金中得以体现。邻居袁老师夫妇俩退休来坡前在武汉工作，儿子留学后在新加坡就业成家，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学习成绩都好，俩孩子都拿过不止一次奖学金，小学三年级期末因考试成绩优秀先后各获300多新元（相当于1700元或更多人民币），不仅如此，两个孩子原来都在附近的“尚育小学”念书，按规定奖学金获得者均被保送转学到重点学校。我曾羡慕的问袁姐“俩孩子很努力吧！”袁姐说“哪里啊，连作业都没有，爸妈不在家时净看手机。”我不信“成绩那么好，不用功还行？”袁姐告诉我“华人家庭普遍重视教育，尚育小学马来和印度孩子多，成绩拔尖的多是华人学生。”

这种情况前些天再一次被印证，我儿子的朋友，一对来自西安的夫妻，周末欢天喜地约请儿子带妻儿去他家做客，原来他小三刚毕业的儿子喜获政府奖学金，并被转学到名列前茅的名校，这意味着孩子将来上重点中学、著名高校有了直通车，还意味着明年该上小学的妹妹也能进入同一所知名小学。新加坡小学有个不成文却被延续已久的规定，兄弟姐妹中老大上哪所学校，弟弟妹妹优先获准同校就读。三年前，朋友为让老大男孩进入这次即将就读的著名小学，夫妻俩费了不少劲最终因竞争激烈前功尽弃，没料到男孩在普通小学因成绩好，借分流制度追赶上去。那天两家聚会中，朋友一句“原想买辆丰田，没想得得了辆大奔！”儿子儿媳听了哈哈大笑。华人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以及新加坡政府对人才的偏爱，通过这件小事帮我看得更清楚了。

新加坡极其重视人才，建国初李光耀先生就强调：“新加坡唯一的自然资源就是人才。”新加坡治国优先考虑的是对人才的投资，国家奖学金制度一路护送最优秀的学生去世界顶尖大学深造。在新加坡读书的学生考上全球名校的几率，比留在原籍者明显要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不

约而同看重新加坡学生，2019年同样分数申报剑桥大学，中国学生申请成功率为13.5%，新加坡学生高达20%。

新加坡政府对所有学生全程跟踪，持续把成绩优异者保送进最好的学校。部分优秀中学毕业生带奖学金进入新加坡最好大学，部分获全额奖学金送往英、美著名高校，成绩保持优秀者再获添加奖学金，直至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然后大多数人自愿选择回国进入重要部门或公务员序列，现任议员、部长中不乏这样一步步靠政府奖学金完成学业的学霸。2015年我写过一篇博客文章《邂逅新加坡议员》发在网上，说的就是我儿子偶遇一名淡滨尼区议员，亲切热情的他，小学中学都曾是“李光耀奖学金”获得者，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成为公务员，2015年已是连任两届的议员了。

### 别具一格的特色教育

我和家人两次到位于市中心的艺术与科学博物馆参观，这座博物馆紧邻金沙酒店，被一座多彩的莲花池围绕着，建筑外观典雅优美，犹如一朵绽放在水中的巨大白莲花，也有人说它犹如伸开的十指，象征新加坡的热情好客。这座现代化建筑的建材采用的是制造赛艇的特殊材料，建筑弧度极其考究，能最大限度地收集雨水，将环保与艺术科学融为一体。馆内更加新奇美观，格外激发人的好奇心与创意冲动，我家小孙开心不已，我们老两口也返老还童，不停地画啊、扫描啊，欣赏自己创造的作品被梦幻般地在彩色超大屏幕上呈现动态画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被激发出想象力和创造性，返老还童中感慨万千。

这次我和老伴儿2019年6月初离京再度来新，一个多月后应约到当时2岁半小孙的幼儿园参加种族和谐日活动，那天一早儿媳给小孙换穿上对襟传统汉装，到幼儿园一看，哇，五光十色好漂亮，活动室张灯结彩，小朋友们身穿汉族、印度、马来、朝鲜、斯拉夫传统服装，一张张小脸喜气洋洋。老师在几张桌子上准备好了多种民族传统美食，请小朋友和家长随意品尝，还安排有大班孩子的表演和反映民族团结的幻灯片。

那次愉快的活动让我耳目一新，回家后借着余兴我了解到这一节日的缘由：建国前一年1964年7月21日，新加坡发生过华人和马来人的严重冲突，造成23人死、454人伤的悲惨事件，为避免种族冲突重演，1997年政府将7月21日

定为种族和谐日，所有学校（包括幼儿园）都在这一天举办纪念活动，告诫国人融洽相处，不分种族和宗教。

新加坡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欧裔人为主，是个多种族国家，政府为种族和谐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在公共场所的各种指示牌和地铁报站均采用英文、华文、马来语、淡米尔语四种语言。新加坡的小朋友们从小就接受种族和谐的教育，不仅为新加坡安宁，也为全世界和平。恐怖主义之所以盛行，起因就是种族不和谐，让孩子从小悦纳种族和谐，各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新加坡这项特色教育我必须点赞。

还有个另类特色：新加坡教育制度素以严格著称，中小学至今允许校长或训导主任在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使用鞭刑处罚学生，有些时候鞭刑甚至可以被公开在师生面前实施，虽然很少施行，且校园鞭子比监狱行刑鞭具细小，但它延续至今本身就会对全体学生起到威慑作用。

### 兴趣培养与务实能干

新加坡注重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新加坡的老师在课堂上讲授过程中允许学生提问，老师解答，以便更牢固地理解和掌握知识。课堂上通常采用课题展示和学生分组讨论，以便当堂消化，必要时辅以课外实践活动，效果明显强于填鸭般的灌输式授课。

据说新加坡课堂教学生动活泼，把每个学生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才算好老师，老师们讲课前先给学生讲个笑话或放段幽默视频，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大脑随之兴奋起来，唤醒充足的精神领悟新知识。中国也有老师能把课讲的妙趣横生，可惜总体仍停留在灌输式教学，把知识塞给学生不利于消化与吸收，许多学生课外不得不再交费上补习班才能完成规定的作业。

新加坡教育不用教材，相比中国采用固定教材授课更加灵活，老师讲课的依据是老师自己编写的讲义，这样更有利教师为不同的学生选择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面对不同接受能力的学生，学校还会开设高级班和普通班，方便基础薄弱的学生尽快跟上教学进度。新加坡学校布置的校内作业也与中国不同，不仅有类似中国的对课堂所学内容的巩固练习，也鼓励学生对所学内容提出疑问或有兴趣深入了解的问题，学生可以写出报告或开放性的作业，以此增长知识，

培养创造力。

很多新加坡中学每个学期都要分组研究一个大课题，这个课题往往是大学生研究的课题。初中学生涉猎大学课题，高校大学生被安排协助完成公司提供的技术项目，难免遇到很多麻烦，等课题和任务完成时，学生们体验到的成功喜悦可想而知，他们从中获得知识，学会团结协作和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啊！

有一次我和儿子闲聊，说起新加坡教育，儿子感慨：中新两国高校毕业生的差距非常明显！我追问“差在哪里？”在IT公司做技术总监的儿子告诉我，十年来已面试并录用过许多来应聘程序员的高校毕业生，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生普遍傲气，眼高手低，做程序员需要手把手从头教起，薪金要求也高。而新加坡高校毕业生低调，薪金要求不高，上手快，因上学期间已经有过多种技术实践，一上岗就能独立干，只差个熟练提高过程，最难得的是踏实，不像大陆的程序员动不动就跳槽。

### 国际化素养整体最高

2020年10月23日，国际学生评估调查结果出炉，这个备受全球教育行业以及学生、家长关注的国际化榜单，这次给小坡一个大惊喜：新加坡中学生的国际化素养在参与评估的27个国家和地区、总计25万学生中排名第一！学霸容易培养，但国际化素养整体性提升绝无可能一蹴而就。这届评估覆盖了涉及全球性课题的知识和技能，其中“国际化视野”这项是考核学生的价值观，死记硬背派不上用场，参与评估的全部是15岁的大孩子。新加坡学生在2020年评估中脱颖而出凭的是什么呢？正是“国际化素养”的高水平。参与评估的27个国家和地区的25万名学生中有6676人来自新加坡的166所中学，拿到国际化素养评估中最高等级，秒杀其他参与国或地区，分数远超平均水平。

“国际化素养”主要考核4种能力：1.对世界的了解程度，2.文化包容度，3.沟通能力，4.奉献精神。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幼儿园小朋友就开始多民族相处和多语言交流，学校和职场都是双语环境。

据媒体披露，此次评估中还参考了各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情况，发现家庭清贫的新加坡学生尽管所得分数较低，但他们的平均分却高过多数参赛国中富裕

家庭的学生，说明在国际化素养这一项，新加坡学生无论家境贫富，有着整体性的领先优势。

新加坡卓越的教育水平与国际化视野，吸引来不少名人政要把孩子送来读书，2020年10月24日文莱国阿齐姆王子英年早逝，新加坡政要多人发去唁电哀悼，阿奇姆王子小学、中学都在新加坡读书，接受基础教育。各国领导子女在坡读书的还有：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的儿子，印尼前总统苏西洛·班邦·优多约诺将军的两个儿子，非洲津巴布韦前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和现任总统的女儿，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的儿子等。听说金融“巨鳄”吉姆·罗杰斯的女儿也在新加坡上学，有不少影视明星如李连杰的两个女儿，赵本山的龙凤胎子女，张柏芝的两个儿子，吴镇宇的儿子等，都在新加坡接受的基础教育。

## 用人唯才与包容开放

“我们崇尚的教育理念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教育，发挥全部潜能。但并不是说每个在新加坡出生的孩子都要接受大学教育。”推崇精英主义的新加坡，把个人能力和成绩视为基础，作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必要条件，原则是保证每个学生接受合适的教育，不同学生有不同的去处。

精英教育充满了竞争性，前提是公平性不容亵渎，熟人关系在这里基本派不上用场，另外无论孩子家境如何，只要肯努力能达标，都能选择并进入理想的学校。数据显示：小六会考中三分之二的高分获得者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奖学金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名校，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

三个月前，多名议员在国会上展开过一次辩论，探讨怎样的教育制度最符合本国方向，并继续关注贫富悬殊带来的教育不平等，呼吁通过教育保持社会流动性。教育部长王乙康重申“保底不封顶”的政策理念，指出：在厘选方案时必须体现出符合用人唯才的理念，未来教育方向要更包容更开放。

2020年，一部关于新加坡教育的纪录片《无声革命，新加坡教育解读》，播出后引起很大反响。这部纪录片跟拍了两名在新加坡政府学校读书的孩子，如实记录了近年新加坡对教育不断反思、改进的过程，观众再次被拥有“全球顶尖教育水平”的现实震撼到，被誉为亚洲第一的新加坡教育体系载誉的同时也面临挑战，促使更多人对政府采取的变革措施进行审视。

教育行业的地位可以从学生参加工作的起薪得到印证，新加坡起薪最高的行业是教育，薪资为 3450 新元，其次才是政府，第三为金融行业。2020 年疫情导致失业率大增，新加坡各行业高校毕业生起薪都有明显降低，唯独教育行业起薪依然是 3450 新元，政府部门起薪略有降低为 3300 新元。需知新加坡奉行的是高薪养廉，公务员薪水不是一般的高而是绝对的高，听说李显龙总理的薪水在各国首脑中高居榜首。我在坡同院朋友姚大姐的儿子十年前从英国毕业回国当公务员，每月薪金 3 万多新元（相当于 15 万或更多人民币），2019 年初因在公务员高等华语测试中斩获高分每月加薪一万新元，我的天，一次考试成绩好，居然每月加薪相当 5 万人民币。在这种前提下，起薪继续保持优势，足见教育行业地位之高。

新加坡重视教育，吸引着企业乐于捐款助教。2021 年 3 月 28 日，冬海集团捐赠 5000 万新币给新加坡国立大学，支持计算机学院推进科研和教育，新加坡教育部长黄循财和国大校长陈永财教授等人出席了当天的捐赠仪式。国立大学成立以来，收到过许多富豪的捐款，2005 年，杨潞龄基金会捐给国大医学院 1 亿元，国大遂将医学院命名为“杨璐龄医学院”；2007 年，李嘉诚向国大公共政策学院捐出 1 亿新币，随后公共政策学院将一幢校园内的建筑物命名为“李嘉诚大楼”；这次捐款的冬海集团 2009 年创立于新加坡，是东南亚价值最高的上市科技公司。

2021 年 3 月 4 日，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正式发布最新 2021 年世界大学排名正式发布，新加坡国立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总排行榜中位于第 11 名和 13 名，在亚洲大学中排名第一、第二名！新加坡国立大学已经连续四年在亚洲排名第一。

2016 年 9 月李振盛摄影作品展在新加坡市中心举办，其间南洋理工大学新闻学院诚请李先生去作报告，李振盛老师让老友我去陪讲，那场报告精彩，师生反映热烈，报告会后校方引导参观，那是我看过的最美校园。新加坡驰名全球的高校有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两所，看过一所想看另一所，2020 年 10 月，我和老伴儿又参观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同样是一所没有门禁的开放式大校园，同样美好有序。回程路上我暗自祈愿：以后不管我孙考上其中哪所高校，我都特开心，也都不会感觉陌生啦！

“每一个人出生时都是原创，可悲的是多数人后来都变成了盗版。”我很欣赏这句话，好的教育是因材施教，培育出多姿多彩、诚实向上的人，而不是用统一模具复制出整批整批的无脑木偶。这是我来新加坡后，对教育的一份新感悟。☞

## 【知行】

# 我有一个银色的梦

吴 蓓

今年年初，我修改留学英国的日记，长江文艺出版社将要再版这本书。在重读当年的日记时，某些段落深深触动了我。“我意识到特殊需要的人，可能正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是高技术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我心中涌起对他们的同情。”

“我愿意帮助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这也是在向强权挑战，强权不仅是政治权力，还有经济权力，科技滥用的权力。虽然个体微不足道，但毕竟可以提醒人们，一些人获利的同时，另一些人成了殉葬品。他们被排挤出‘正常’社会之外。我愿尽我所能，给予他们一点点关怀。”

那时为了挣些生活费，周末我去餐馆做服务员、去宾馆做清洁工。我力气小、英文差、反应慢，总是害怕自己被解雇。

有一天我写道：“连莉莎这么漂亮能干的女孩都担心干慢了被辞退，更何况我！下次我还得加快速度。欣慰的是领班琼检查了6个客房，很满意，没有挑出毛病，只是要我快点。好像是一架大机器，只要进入其中就得像机器一样的运转，如果跟不上机器的运转速度就得被淘汰。在这架机器中，我几乎成了特殊需要的人，跟不上转动着的机器。但我必须跟上，没有余地。有些特殊需要的人可能就像我这样，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都适应不了机器的节奏，他们只能被机器社会淘汰，成为精神或心理有疾病的人。”

最近几年有些私立学校，想入学的孩子实在太多，他们通过考试或者品行来挑选孩子。我想那些学习吃力或品行不端的孩子怎么办？如果有可能，我是

否可以做个小小的学堂，接受被“淘汰”的孩子？

接受那些被应试教育“淘汰”的孩子，被家长不恰当的养育方式摧残的孩子，接受那些不符合现行标准的孩子。我想有个小小的学堂，让孩子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让他们的身体在大自然中得到舒展，让他们的双手能够为自己也为他人来劳动。

十几年前我的一位邻居在精神病院目睹小学生精神失常，十分的心疼。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等到孩子精神崩溃，后悔来不及了。如今，孩子们的现状越来越令人担忧。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陈默教授从1999年开始，为8千多个城市家庭做过心理咨询，她说：“我发现从2004年起，孩子因为焦虑而引起的心理问题，成几何级数地在提高。”

徐凯文是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他在高校接触到的部分学生“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他们也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称许，但是他们有强烈的自杀意念，不是想自杀，他们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整个国家自杀率在大幅度下降，但是中小学自杀率却在上升。”

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开始自杀，肯定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有这个社会、时代，都有严重的“病患”了。我想做的是在孩子年幼的时候，提供一个温馨、自然的地方，让孩子们绽放出生命之光，是人活在世上的本来具足的光明和丰盛。

几个月前我就起心动念，但现实的种种考虑，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自然环境，就得远离城市，如何能够兼顾年迈体衰的父母？谁与我同行？总不能我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不开始，有谁知道？

五月初我和乔艳坤老师说起我的想法，她立即回应，她也想办这样的学堂，她愿意和我一起去尝试。我和乔老师认识有十五年了，我对她十分的敬佩。《下乡育儿》这本书里提到的乔老师就是她。

我们一起去寻找合适的场地，几经斟酌，一致认为安徽泾县黄田村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日本自然农法的创始人福冈正信认为由人的欲望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所谓的现代化“说到底，它们也是毫无价值的。我确信，真正的真、善、美、快乐只有在自然中才会被发现。”黄田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



周围群山环抱，溪水长流，处处是美景。

被体制“淘汰”的孩子，不符合老师要求、家长期待的孩子，心理压力过大的孩子，热爱大自然的孩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黄田小院。也许一周，也许一月，也许一年，我们愿意成为你们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同伴，愿意牵着你们的小手一起迎接日出、目送夕阳。

最近读到罗大伦老师的文章《让孩子在山野间长大》，他的写道：“觉得孩子脾气暴躁，还爱生病？带他去田野玩耍吧！”有的家长问如果孩子一个人去乡下，没有家长陪同，能行吗？罗老师回答：“其实，有些家庭环境，孩子离开，对他来说，很有可能是幸福的事情呢。”原来我是坚决反对孩子寄宿，可是目睹现今孩子的遭遇，我开始认同罗老师的意见。我们也会有条件地接受需要寄宿的孩子。

我的梦想是银色的，像月亮的银色——温和、柔情、清雅、凉爽。我的梦想不是金色的，像太阳的金色——灿烂、激情、耀眼、灼热。这个世界需要阳光的热烈，也需要月光的静谧。需要金光闪烁，也需要银辉朗朗。我们有了太多的成功，高科技、高铁、高速——整个世界奔跑得越来越快，我们的身体跟上了快速的节奏，我们的灵魂在哪里？好几次，我乘坐高铁去了另一个城市，身体到达了，好像魂还在半路上，跑不了那么快。

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安放我们的灵魂，她不需要喧闹的城市，不需要四处奔波，不需要嘈杂的信息，她只想静静地安住在土地上，安住在花草树木之间，安住在蔚蓝的天空下。

这样一个地方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也为了我自己，以及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乔艳坤老师认为，人活在世上要有信仰，信仰不是宗教，一个人可以不相信任何宗教，但要有信仰。信仰存在着“天地之道”。她告诉我：“心中有信仰，身上有力量。”

我有一个银色的梦想，为这世上减少一个精神病人、一个自杀者、一个罪犯而奉献。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嘴上，而是行动起来。去服务，而不是去统治，去帮助而不是强制，去爱而不是伤害。

你告诉我云朵，我在饭碗里找见云朵。

你告诉我神的光晕，我在孩子的面颊上找到光晕。

我来世上，和真实的物质发生关系。  
我的每寸肌肤都浸泡在生活里。  
你告诉我神的故事、大师的故事、遥远奇异的故事、艺术的故事，  
可我要照顾果园、伺候土地、捡拾麦穗。  
我的全部心思都浸泡在生活里。  
你告诉我祖国的故事，成功与荣耀的故事、隐士的故事、智者的故事，  
可我要拖地，要和孩子赛跑，要把一锅粥煮得香甜。  
我的全部体力浸泡在生活里。  
你告诉我仇恨，不幸与恩怨的故事、得失与恐惧，  
但我要去抚摸木头、去爱，去疼惜小动物，这都需要全心全意。  
我的时光全部浸泡在生活里。

（选自安贫诗歌）

青檀学堂 2018-10-03

## 【述往】

### 周扬女儿的回忆（二）

苦难人生十二年（1968—1972.4）

——文革中期，下放苦练

#### 周密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自1969年春起，七机部在京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们”被分到几个大军区农场“接受再教育”，“916”和“915”两派的头头们结成“一帮一，一对红”，一起到解放军大熔炉里锻炼。

永定路地区的干部由广州军区接纳，第一批已于69年春天敲锣打鼓地欢送走了。我赶上8月走的第二批。十二所和二院直属机关分到广州军区潼湖农场，还有些二院单位分到湛江农场、汕头牛田洋农场。

火车先把我们运送到广州，在那儿整顿学习了两天。我抓紧时间去看望了一下叶华明的姨妈。1968年5月初，我在这条小街的保健所生了次女东东。当时北京两派打得正凶，连医院也卷了进去，所以我决定到没人认识我的遥远的广东生孩子。我在广州住了有两个月左右，一家人都对我非常好，东东也留下由他们照看，直到我下放前不久他们才把她送回北京。这次我短暂的来访，他们对我依然很热情。才一年多一点，姨妈明显地老了瘦了，对未来形势完全失去信心，我无话可说，也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她最后的诀别。两年后她肝癌去世，才活了68岁。表妹陪我上诊所看了看病，拿了一些治膀胱炎的药，我就匆匆赶回集结住处了。

从广州乘火车到樟木头，那时还是一个没有站台的小站，又坐卡车走了约一小时便到了处于东莞和惠阳地区的军垦农场。七机部的下放干部分成四个连，我们女干连营地住在沥林村不远处。一开始，连排长、司务长和炊事班都是部队派来的，约十一二个人，几乎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达后第一件事便是给自己盖营房。部队干部已把粗竹竿围成一长方圈。竖杆上又扎上一排排横杆，宛如一个牛栏。然后把长长的稻草合上红泥土，用脚踩匀弄软，我们就从中抓出一大绺一大绺的稻草泥挂到横杆上，由下而上一层层挂，像晾衣服一样，再用手捋平，这是墙。不糊挂泥的地方就是门和窗。干部们同时在房顶上忙乎，把大片大片的葵叶、蕉叶铺盖在竹竿扎的房顶架子上，再用铁丝、竹条等固定压着。大家动手，干了没几个小时，两间泥草房就完工了。铲平了屋内的地面，钉了几个桩和垒了几个砖台，上面搭上木板，做成两排大通铺。当天或是第二天我们就入住了。

南方有南方的好处，垒个窝这么容易！

除了团部以上机关，基层部队都住草房，弹药房也是草房。我们去没几个月，就碰上一次弹药库着火，熊熊的大火中，子弹炮弹噼啪乱飞，我们趴在不远处的土坡后，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团的弹药烧了个精光，没法救。事后查明原来是几个老乡小孩在房边玩火，点燃了房顶垂下的葵叶。

广东这地方四季如春，香蕉便宜，蔬菜不断。连队养了一群鸭子，以后到了湖南又添了猪羊奶牛。湖南农场土地肥沃，我们种菜又有了经验，所以下放近三年，不仅可以吃饱，伙食还不错。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后来到湖南，都是

气候湿热、景色美丽的地方，也是各种动、植物繁殖旺盛的地方。

叫我最讨厌的是蚊蝇蛇鼠。蚊子多而大，我们一年四季都睡蚊帐，一熄灯，帐外蚊声嗡嗡一片。白天坐在屋里，蚊子都隔着棉毛裤咬大腿和臀部这些裤子绷得紧的部位。我们营地厕所是在野地挖个坑搭几块板，周围长满草，绿豆蝇像串串金绿色的珠子垂挂在长草叶上，人一进去，嗡一声飞开，草叶弹起，若这时草里有条小蛇，它马上就爬走了。灶台周围主要是大黑蝇，做饭时水一滚，一掀大锅盖，苍蝇就像“炸弹”似的落下去，好在炊事员有经验，趁还没沉入，赶紧抄箴篱捞出大部分。有次晚上在灶台撒了不少“敌百虫”，第二天扫了一大碗黑蝇。到湖南后营区条件改善了不少，除了5—6月蛇多之外，苍蝇少多了。

“林彪一号通令”时连队去拉练，我和徐东华住在生产队长家，大米煮熟后捞出堆在大箩筐中，锅里稀米汤加入红薯熬熟喂猪。我俩见那米饭上黑压压落满苍蝇，就捞锅里刚煮好的红薯粥吃，人家说那是猪食，我们说就爱吃这个，人家说北京没有红薯吧？我俩说，有是有，没这儿的甜。南方的老鼠都会耍杂技，在墙壁上爬得飞快如履平地，在我们晾毛巾的铁丝上从这头窜到那头，还会顺绳向上爬。真是了不起。有天听到储物室叮叮咣咣，还打碎了什么，原来是炊事班在米缸里捉住一只一斤多的大耗子，炒了一碗肉。大部分人不敢尝，我既馋又胆大，和几个战友分吃了，像子鸡，很鲜嫩。

南方老鼠多，蛇也不少，开春后常能在田间草地碰见。有次我们在甘蔗田锄草，甘蔗已长得一人来高了。一个战友突然大叫一声扔下锄头从里面跑了出来，说是看见一条眼镜蛇，立起来冲她瞪着眼看，蛇眼对人眼，恐怖死了，吓得我们跑出来都不敢进去。幸而连干部们闻声赶来，抄起锄头追进去打死了那条蛇。又一次，有个战友上厕所，听见身后窸窣响，一条蛇正从泥墙的葵叶下爬进来，也瞪着蛇眼盯她看，吓得她不及方便完便逃离现场，其狼狈相可想而知。

凡事见多不怪。第二年我们转到湖南，也常见蛇，但已不太害怕了。有个战友早上醒来看见蚊帐顶上一团黑东西，便说，谁把衣服扔我帐顶上了？她抬脚轻轻向上一踢，那团黑物散开，原来是一条蛇！一屋住二十来个人，床靠床，帐挨帐，为什么蛇偏偏爬上她的帐顶？后来大家分析，大概是因为她正好放了几个松花蛋在床底下，蛇是最爱吃蛋的。又一次，我和小羌在棉田打农药，抓

到一条无毒小蛇，只有两尺多长。我俩用尼龙绳拴住它的脖子，拴在小树根下，又用剧毒农药 1059 喷它的头，直到它完全不动了。可等我们打药回来，它又活过来了，我们剥了蛇皮，拿到一整片白色的蛇肉，带回营房（听说焙干蛇肉可治哮喘），那片肉还在我手中蠕动。现在想，我们是这么残酷地杀害了一条顽强的生命。

广东的鱼养在池塘里，池塘边上空搭厕所，大便落下去鱼就过来争抢。在制作虾酱时往往从发了酵的尿桶中掏几大勺搅进去。所以有人编了几句打油诗：

广东美食传四方，肥美鲤鱼大便养。馄饨馅里掺蚯蚓，男人小便调虾酱。

这几句打油诗有点损，不过我们北方人以后碰到这类食品就要想想了。

我们这批人 8 月到达时，早稻已收，晚稻已种，农活不多了，干干修理营地、种菜养鸭养猪之类的事，很多时间用来政治学习，拉练、军训打靶什么的。早请示晚点名，集合唱歌祝罢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之后再吃饭等等，生活上完全军事化。比起后来转到湖南西湖农场的劳动强度要轻得多。

这个军垦属 42 军 124 师，是很有些光荣传统的部队，从东北一直到海南岛，又是抗美援朝时第一支入朝部队，在朝鲜狠打了几个硬仗。政治学习中，听过几次战斗英雄的传统教育报告，多半是四野的光荣战史。那些硬仗都是牺牲掉许多战士的生命换取的。比如迎风山一仗，一个连只剩下一个通讯员，最后连长强迫他下山送信，其实也无信可送，只不过是保全这个 16 岁的孩子而已。这个小通讯员就是我们团的宣传科长。聆听这些悲壮惨烈的史实，我反而生出许多凄凉来。不理解为什么指挥员这么“狠心”。虽然我一直认为如今早已不是几百年前的冷兵器时代，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起主要作用，手榴弹拼不过原子弹，赫鲁晓夫说咱们的民兵是“一堆肉”，原则上也没错，不过当时可不敢说这些，否则我将罪上加罪。

大约是 70 年代初，珍宝岛的战斗英雄孙玉国来给全团（全师？）指战员做了一次报告。会场是一片开阔的草地，报告作了一上午，好像很生动，可惜内容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坐在那儿悠悠的遐想着黑龙江两岸苏联的和咱们的小伙子们在那儿厮杀，心中泛出一股说不清的苦涩。这次报告会后只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那天我们凌晨三点多就集合出发，4 点到达时会场的草地上露水很

重，但命令我们必须席地而坐，不许垫任何东西。报告结束时，场地上干干净净，但人人屁股上一大块湿印。照例，是各连集合排队离开。途中，我见男干二连的男同志们排成两行站立，不少人手里拿着一把稻草或一块硬纸板，正低着头听他们指导员训话。走过时，顺耳飘过几句话，逗得我们女干连的同志掩口窃笑。那指导员说：“你们这些臭老九屁股就是香的？就那么娇贵？地上就不能坐了！谁垫了东西把手伸出来啊！偷偷摸摸，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干什么？你们屁股比金子还贵？搞这些阴谋诡计！……”。可笑的是我们这些三十大几的臭老九男同事们都低着头老老实实，挨这位“小解放”的训，也不明白那一大堆政治帽子和那把稻草有多大关系。后来听他们讲，那天至少训了十几分钟，他们连队最后离开会场，只因肚子饿得前心贴后背，低头认错才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初到军垦时，我很高兴，因为，只要对我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周围同志就又敢对我微笑和跟我讲话了，我又能和大家平等相处。但慢慢地我意识到这是假象的平等。尽管我努力改造，叫干啥就干啥，可我还是有个另类阶级的身份。连队里正副指导员、正副连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我很快就知道负责监督和改造我的是指导员，每次找我个别谈话的都是指导员（换过几任），给我规定平时每周必须交三篇稿：讲用稿、大批判稿、坦白交代揭发稿，清队和其他运动期间还得另加。1970年初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不久，王指导员像往常一样在熄灯前把我叫去。平时白天一起劳动时，他也像别的连排干部一样对我和和气气，只有在晚上个别谈话时才挂下一张审讯脸。这次他显得格外严词厉色，说我还有不少问题没交代，说我应当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蒙混过关没有好下场”这些道理。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下放前在所里当反革命时，我已写了多次揭发交代，早已搜索枯肠也想不起还有什么新鲜东西了，来军垦后又一遍遍地写，还是那些玩意儿。王指导员冷笑着问：“你敢封口？”又说：“我知道你现在最怕什么”。我愣住了，只能说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严重的问题没交代，而且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说不上自己还能怕什么。没想到我这无力的辩解激怒了他，突然“啪”的一声，把一个本子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那是一沓稿纸订成的本子，约有两厘米厚，封皮上赫然写着“《周密言论集》（上）”，我吃了一惊，难道我被揪出来之前（1968年8月前）说了那

么多的话？是我说的吗？正在发蒙，他突然说：“我知道你是怕我们枪毙了你，告诉你吧，不会的。”我又吃一惊，又觉得有点可笑，于是壮着胆说，我从来没想到被枪毙，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犯了多大罪需要枪毙我？又说，但我实在不明白还有什么重大问题没交代。当苏修特务？投敌叛国？也没这个条件和机会呀！能不能提示一下叫我回去考虑。他说，你往经济问题上想吧！我更糊涂了，我是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从来没和公款打过交道呀。他问，你卖过一次单位的旧报纸吧？钱上哪儿去了？——噢，原来如此，去年在所里劳改时我的确和一位同事一块儿去卖了一麻袋旧报纸，十多块钱。当时就交给了同室的李金玉，她还记了账（幸亏记了账），又幸亏李金玉同志也下放在一个连里，第二天疑问全清楚了，洗刷了我“贪污”的罪名。

折腾了大半夜，又挨了要枪毙的吓唬，原来就是为了用这卖报纸的十几块钱考验我是否老实，这种教育改造方法实在太低水平了。我的收获是发现了有一本我的言论集，还挺厚。还是上册，我估计是揭发我的各种材料的合订本，像是手抄的。几年后要平反时，领导问我要不要看这些“黑材料”再当我面销毁，我说不用了。所以以后再没见过。

同为“军垦战友”，也要有阶级排队，护校的学生一般都是依靠对象，学历高一点的就多半要夹着尾巴一些。个别年轻的姑娘，平时一块生活劳动也和你说说笑笑，哪天她要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就有权拿你撒气，突然翻脸侮辱你几句，什么“别忘了你是现行反革命！”“你就该老实改造，有什么发言权！”提醒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这类不愉快并不常发生，事后也往往能得到其他战友的劝慰。后来我想，学会忍受屈辱也是文革对我的一种锻炼。

实际上，既有“排队”，受到歧视的又何止我一人，只举一例吧：1969年底“林彪一号通令”后不久，连排组织一次拉练，又开会批苏修，分析形势，大家表态，一旦苏修打过来我们怎么办等等。我相信我们这批年纪大一些的大学毕业生谁也不会认为会出现这种形势，不过开会时人人的表态都充满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战友陈秀江原是情报所俄语翻译，她表示一旦打起仗来，她自愿奔赴前线对苏修士兵喊：“放下武器，缴枪不杀！”连干部表扬了她的发言，说能结合自己的实际行动。第二天，一个对我最友善的炊事班的小战士，19岁，姓黄，在我帮厨洗菜时悄悄对我说，昨晚连干部一起聊天时（炊事班就住在连

部隔壁，同一草房，隔半堵泥墙）说，如果苏修打过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这些懂俄语的“突突”了，省得他们叛逃，“还想上前线当翻译，做梦吧！”小黄问我懂不懂俄文，我说懂，他叫我千万别暴露（真是傻孩子）。

又过了不久，炊事班的战士们都要回原连队中去，要我们下放人员组成炊事班。都知道炊事班是连队中最辛苦的，起早摸黑，担水挑柴作一连近百口的饭菜，于是连长让大家自愿报名。我也积极报了名。小黄马上对我讲，你干吗报名呀，领导不会批准你去的。我说炊事班是最艰苦的岗位啊，他说但必须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去，他们担心你这种人放毒怎么办？果然平时常把最脏最累的活派给我的连干部们却没让我进炊事班。这个小黄回炮连前给我悄悄留下了他广西农村老家的地址，说他也快复原了，万一我碰上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可以上广西找他去，千万别想不开。年底我们转到另一个营地潼湖农场本部后还收到过他一封信一张照片，我担心连累他没有回信，还销毁了他给我的信，只是留了照片。次年四月，我们转到湖南西湖142师的军垦农场，就完全失去联系了。

多年后，每当我回忆起文革期间这段另类对待时，我悟出这是上天对我有意的安排。他使我变得能够忍耐，这个“忍”中并无半点韬晦之心，报复之意，而是一种对人的宽容大度，使我从此能从更高的角度和基点来认识人类、认识历史、认识世界。我感谢命运的安排。

1970年3月，广州军区的七机部下放人员都集中转到湖南西湖军垦农场。这是个四面环水围湖造田的人工岛。进出都通过一个叫柳林嘴的小港口。据说这里曾关押过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战俘，我们到时，原劳改人员当然全都不在了，换上文革下放改造的人群。原模范监狱里住着广州军区团以上干部，当然全是“有问题”的，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的秦基伟，被单独安排在一个战士连里，不允许他和战士交谈。这个连紧挨着我们一个男干连，他偶尔有机会和男干连的同志有点交往，还吃过他们包的饺子。高墙四围还留有铁丝网。老头们进出干活，都不与人打招呼讲话。我们称老头连。七机部的五个干部连（两个女干连，三个男干连）都分散在湖区各处。还有几个学生连，里面有北大西语系的学生，学生们就比较随便，路上遇到我们问长问短，打听外面有啥新闻，我怕惹麻烦，尽量不和陌生人交谈，避而远之。其中有个瘸子我看他气度不凡，侧



面一打听，原来是聂元梓“北大公社”对立面的一个头头，被对方捉去膝盖里钉了钉子，残废了。农场中除了这些下放改造的，当然还有战士连队。这个农场属142师，文革后又听说这是林彪的一个黑师，即编制外的师。传说，60年代林彪乘坐直升机在这个湖区上巡视过一次，然后就定下这个点了。我要是个“戏说历史家”，就会写个林彪坐船到这儿访问他的老对手杜聿明的故事。

我们到西湖时正赶上早稻插秧，每天一大早就下到深过膝盖的冷水中插秧挑秧，累得要死不说，各种病都来了。妇女病最多，腰酸腹痛，月经不调，再就是关节病皮肤病。不少人因蚂蟥蚊虫叮咬不愈而长脓包。小蔡生长在城市，不会肩挑，把扁担放在背上弯着腰走，干活笨手笨脚，总是满脸满身泥水，惹得大伙哈哈笑。她的两条腿被虫咬的像梅花鹿一样，有的疮肿得发亮。可也没听她叫过苦。和大多数下放干部一样，我们当时坚信毛主席，劳动改造决心大，自觉性高。

入夏后我被分到棉田班，背着药筒巡逡于棉田中打剧毒农药1059和1060，偶尔也用用“乐果”。虽规定要戴口罩，蒙头巾，扎裤腿，可在35~38℃高温下，在闷热的棉田中行走，谁能穿那么多？就这么着还浑身被汗湿透。因农场是围湖造田造出来的，像个大盆，四周高中间低，大田一般都在洞庭湖水平面以下，气候特别湿热。因此植物也生长的茂盛。那年在路边积肥堆上发现一棵棉花，足有一人来高，结满棉桃，后来特意保护了一番，秋天挖走运到军区某地展出，据说一百多个棉桃，变成我们军垦农场的成果和骄傲。我们自己种的棉花，包括老头连、干部连和战士连，老头连亩产第一，战士连最差，平均亩产籽棉才一百斤多一点。

转眼到了盛夏双抢季节，双抢就是抢收早稻抢收晚稻。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出工，干到6~7点在田边吃早饭，又干到11点多收工，12点午饭后休息到下午6~7点又出工，到晚上11~12点收工。这期间我们女干连配合战士连一块儿干活。最累的体力活，如脱粒、犁地和耙田都是年轻战士们担当，我们只做割稻、捆稻草、插秧、挑秧等活。那时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在38度的酷暑下，连续奋战十几天，好些个战士累得晕倒在田里，干部连中也有发高烧不下火线而晕倒的同志。我全身的衣服和打了4~5层补丁的旧军裤，每天都被汗水完全浸湿，只有衣角处两小块干的地方。中间偶

尔休息5~10分钟，我们一瘸一拐走到路边，躺下就迷糊了。中午回营地吃完饭，往往又累又热吃不下多少，脱光衣服拿桶水冲一下凉，爬进蚊帐，累得连话都懒得讲。下午集合出工时，又穿上被汗浸透尚未晾干的工作服出发，干到半夜，在手电的照明下，一脚高一脚低走回营地，好像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状态。十几天下来，人瘦了一大圈。

男干连同志因没有战士做主力，比我们累的还惨。有几次收工路上经过他们田边，只见他们上身是破网般的背心，下着裤衩，腰里拴一块围裙般的肮脏塑料布，真像一群旧社会的乞丐。现在年轻人决想不出他们那副模样。无怪事后一位男军垦战友曾感慨地说，咱们那会儿真是九死一生脱层皮呀！

我想这正是改造我们的人所希望的。有次团参谋长（好像姓郑）来地头视察并动员，讲了不少表扬大伙儿（包括战士）的话，但有两句叫我永生不忘，大意是：就得叫你们这些臭老九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讲了，才能把你们改造好！这位参谋长出身好，苦大仇深，战争中还立过功，他对我们训话前常讲的开场白是：“我是个大老粗，肚里没墨水……”他这么讨厌臭老九，估计也是当时政策使然，不是他的过错。他本人是个绝对迷信毛泽东的农民。

在南方，一般秋后农活就少多了，摘棉花、积肥、养猪羊鹅鸭，干些杂活。潼湖后期，我在养猪班干了一个多月。几十头外国大猪是师部分配的任务，连队自己养一些中国黑猪，用以改善饮食。黑猪比白猪聪明，讲卫生。都说猪脏，其实不然。它们从不在卧室（一堆稻草）里拉撒，即使夜里也会到别处上“厕所”，然后拱进干燥的草堆中接着睡。都说猪笨，更不对。每次连里改善伙食，都是连队干部去圈里逮猪，于是但凡我们挑着猪食去喂，它们都争先恐后挤过来。一旦看见我连的干部来了，就四散奔逃（别的穿军装的人一概不怕），个别猪能跳过一米高的圈墙，窜到庄稼地里，怎么也逮不着。西湖后期，又分到奶牛班，每天铲粪，打扫牛棚，挤奶，调饲料和放牛。这是一群荷兰种的奶牛，其中最老的一只是从荷兰空运来的，耳朵上剪有档案号，已有22岁，产奶量很少。虽然很瘦，庞大的身躯，仍然能够使人依稀想象到它当年的风采，大概是这群牛的老奶奶。牛们很尊老，每次放牧，它都走在最前面，哪怕走得再慢，别的牛也不会超越它。一次，过一条土沟，它没跳过去，摔在坑里，牛们围在旁边不走。我们叫来了连干部，也无法把它从坑里抬出来，它不挣扎也不叫，

只是呆呆地看着围在四周的人和牛们，眼里滴出一串泪水。连干部们说没希望了，大家割了些草，放在它嘴边，又拖来一些树枝搭在坑顶上遮阳，我们勉强把牛群赶了回去。第二天上午经过那儿时，坑已经被填平，我知道老牛已被埋在其中，因为奶牛，军马军犬等都不许被剥皮食肉，必须全尸掩埋。此后领头的便是老奶奶的女儿，牛群到达被填平的坑边时，都停下来不走，围了一圈哞哞地叫，声音十分凄惨，连我这个赶牛的都忍不住倏然泪下。一连几天，牛群都固执地来这里缅怀几分钟，我们想绕道而行都不可能。

在西湖农场，我们女干三连的驻地在公路边上，来往行人很多，刚来时常丢失晾晒的衣物。连队只好养了一只小狗，这只小黑狗很快就长大了。与当今的宠物狗不同，它从不和我们一起玩耍，总是骄傲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搭理人。可也怪，一进来外人，它就追咬，奇怪的是它能分清何为外人。我们女干三连的周围几里外有不少居住点：师部，战士连，男干连，男学生连，老百姓的居民点（多半是为劳改释放犯所建）。男干连和男学生连都不穿军装，平时也是破衣烂衫，和老百姓居民点的人没有区别。可狗就能区分得出来，它从来不追咬周末来看望我们的男同事们。

在军垦我们不养鸡，不知为什么刚长大一点就得鸡瘟，全死了。后来改养鸭子和鹅，好养，长得快，从春天养到夏末双抢季节，正好可以改善连队伙食。鹅很有意思，早上把它们赶到水沟边放牧，上午有只雌鹅要下蛋了，一只雄鹅陪它回家，雌鹅进屋下蛋，雄鹅在门口守候。下完蛋，雌鹅出来吃完炊事班撒的一些营养餐（一把稻谷或碎黄豆）两口子就又摇摇摆摆地回放牧地了。这期间，若好奇想看看雌鹅如何“分娩”，准会挨雄鹅一番追咬，就连小黑狗也不敢靠近“产房”一步。

聪明狡猾的猪，驯服忍耐的奶牛，夫妻恩爱的鹅，识别能力极高的狗，它们都有灵性，同类之间很有情义，我和动物们单独相处时，觉得心里更轻松一些。在牛班是我军垦几年中最轻松的时光。班长林彬彬也来自十二所，她是程子华同志的女儿，也是解放区长大的。干起活儿来胆大不娇气，和我脾气相投。她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我经历也较相似。她时常派我去放牛，这是最轻松愉快的活儿。我可以坐在田野里看看蓝天白云，享受大自然气息，脑子里一片空白。有次碰上一个小战士，拿张歌片让我教他唱歌，几次相

遇下来，他悄悄对我说，听说你们连有个周扬的女儿，哪天你带我去看看。我说，我就是。他的脸唰地红了，张口结舌。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了。

我们女干连大学毕业生只有十几个，更多的是中专、技校和护校的年轻姑娘。尽管那个年代是学历越高越不受信任，但连队干部们因自身文化不高，还常常利用一下我们。比如小蔡，非党员，属“可教育好的子女”，可年终、季度中的四好连队总结报告还常让她代笔，以连党支部的名义上报。从在潼湖起，我就常常被派给墙报、板报画个报头和花边什么的。这些装饰无非是红旗、红太阳、大海、向阳花几种。有次说师领导要来视察，叫我们出一期漂漂亮亮的墙报。我觉得平时用的红色太多了，鬼迷心窍，这次来了一圈黄色向阳花，配以绿叶。剪、贴、画都已搞完，正打算到营地外散散心，排长张瑞华匆匆跑过来（西湖时期干部连的排长由解放军换成下放干部来当了），说指导员来检查，大发雷霆，赶紧重新搞。我和她急忙跑师部小卖部买红纸，剪了一大堆红旗红太阳，让墙报红彤彤起来，才算了事。

不久全师干部连搞文艺会演，却叫我这个重点改造对象编个对口词（俗称三句半）和写个小剧。好在那时的“剧”实质上是活报剧。倒不很难。在后台碰见女干四连的付凝，当时她是十三所下放来的，现在笔名叫戴晴，已是海内外著名作家了。她虽说是哈尔滨军工毕业生，却很有文艺才华，自编自导自演，样样来得。我对她说，她那个剧写得挺好。她说，什么好不好的，现在的文艺就是“台上踹一脚，台下吓一跳；台上几声吼，台下直发抖。”（大意如此，我记不清了）。吓得我赶紧叫她别胡说。她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这是周总理讲的。她说的是否真有其事，到现在我也没搞清。

虽然在南方几乎没有农闲的时候（我们特羡慕那些下放到沈阳军区的人），闲一点时部队领导对干部连进行形势教育、传统教育，只是后期没再搞“清队”了。1971年8月20日—9月10日双抢之后，又开始“基本路线教育课”，指导思想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以中央两报一刊‘七一’社论为依据，紧密联系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省军区孙副参谋长讲课。山东人，1939年参加革命，他父亲五十多岁时参军，抗日时牺牲了。母亲被汉奸打断了腿，他身上满是伤疤，是各个时期日本人、美国人和国民党留下的“纪念”。解放海南岛他是43军渡海先锋营营长，打仗身先士

卒，立过大功。他很生动地描述当时的战斗情况，小木船渡大海，风浪大，许多战士先是吐饭、继而吐黄水，继之吐血，最后吐蛔虫，一堆堆蛔虫从嘴里吐出来！一上岸就打仗，有时一天打好几仗，有次24小时内打了一白天的仗，吃一顿饭，走120里路。这样的苦，这样的难都没有压倒当年的解放军战士！同时他又详尽地讲了当时解放海南岛的作战部署和经过，以说明林彪、李作鹏指挥的如何如何英明。可惜这部分内容我没记录。忙完农活已是“913”事件之后，10月29日开始学习中央68号文件，要揭穿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三个阴谋，四张画皮”，批透其“三个谬论”。还是孙副参谋长来讲课。他从1945年12月31日山海关失守一直讲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总之，林彪和黄、吴、李、邱等人指挥如何如何失误，多亏毛主席正确领导，四野才能横扫湖南，解放海南。林彪不仅无功，反而有罪，彻底剥开了林“常胜将军”的画皮。不管九月中和11月初讲课怎么不一样，我们都专心听，认真记，热烈讨论，因为政治学习时，每人必须发言表态，并谈心得体会。像我这类特殊对象，还需交大批判稿。有次我写得太少，也不深刻，当时谢指导员把我叫去狠训一顿，说我敷衍了事，蒙混过关，把我的批判稿摔到桌子上。我当时对林彪为什么要坐飞机匆匆叛逃也不很理解。更和这个军队集团的人毫无关系，真不知怎么写自己才能“过关”。据说后来我们调回北京后，他升任了营指导员。

到1972年初，军垦下放人员约有一半已陆续调回原单位或调到他们的家乡。批判林彪集团时，有消息传来，说军垦剩下的这一批，多是政治上不可靠分子，他们打算经过最后一次排队后，剩下的都送山西大同，男的下煤窑，女的分到一些小企业中当工人。“9.13”事件之后，这个计划破产。这里摘录几段1972年1月22日的日记，反映出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感想。

“原想将来有份工作，逆来顺受，能平安过一生就行了，没想到等待我的远不是个称心的工作岗位，而是监狱、手铐，说不定还该枪毙。”

“天天在这儿改造思想，写心得体会，斗私批修……你不想惹他，他偏要惹你，而且还要你的命呢！……”

“托毛主席的福，不然我们这批人死了都不知道到哪儿喊冤去。毛主席，但愿您老人家长寿几百岁！”

1972年3月初，我最后一次从北京休假回到农场后不久，就知道了最后一

批军垦人员全部返京的消息。这时的女干连尚有129名在编人员。3月10日—22日给我们十几天休整休息时间，3月23—30日进行分配教育，实际上绝大部分都回原单位。3月31日出发，从柳林嘴坐船到长沙，4月2日乘专列，4日到达北京。

其实，这两年八个月的军垦下放生活内容，足足可以写出一本长篇小说，只是一则本人笔拙，只会真实记录，二则年岁大了，不愿老回忆起那些叫人心绪沉重的往事。历史往往是一段分不清是非功过的时间过程，一切主导历史车轮的伟人，大都是既有功也有过。而那些只求温饱的草根阶层，在跟随历史车轮晕晕乎乎地瞎跑时，只要能维持做人的道德底线就已经不错了。❷

## 【访谈】

### 李春光口述：怀疑一切<sup>1</sup>

文靖 采访/整理

—

我的父亲李一平是1904年生人，年轻时候参加大革命，包括北伐等等。但是他看到了政治的污浊、充满了血腥，“国之不国，人之不人”，于是在庐山办学。像徐悲鸿、陈散原（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也包括熊庆来、李四光等等，他们都非常熟悉，黄炎培还亲自去考察。

学校办了八年，蒋委员长去了，请他讲学孔孟之道，我父亲很不客气，说：“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钱，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谈孔孟之道。”于是拂袖而去。蒋立刻下了指示，说他“聚众讲学，图谋不轨”，把学校解散了。那是1937年的事，散原老人病榻上给我父亲写信，说：“豺狼当道，时日曷丧！与汝皆亡！勿为此戚戚也。”若干年后我们到北京，陈家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你不要看我们家家具破旧，很多都是散原老人的遗物。

1938年，父亲带着我哥哥和我妈妈，别人给了他一些钱，这才到了上海。

<sup>1</sup> 李春光（1940—2017）：祖籍云南大姚，1958年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文革中，是学校造反派组织“北京公社”核心成员之一，以敢讲真话而出名。晚年旅居美国，因车祸客死他乡。

然后坐船到河内，辗转到了云南，在家乡办了一所大姚中学，现在叫“大姚一中”。后来，龙云也知道了我父亲，于是召见。结果我父亲当面告了龙三公子一状，那是当地出了名的恶霸，没人敢惹。龙云觉得很奇特，因为大家都说他儿子怎么好、怎么有出息，只有我父亲讲了很多他看到的问题。龙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最后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父亲拒绝做官，最后只接受“省参议会的副议长”这么一个职位，而且不拿一分钱。我父亲说：“我知道，如果接受了他的钱，就会失去他对我的尊敬。”

从云南出来，我们在香港住了三年。后来龙云也躲到香港，住在龙大公子家，周恩来就希望我父亲能做龙云的工作，促成云南和平解放。记得龙云当时有一句话，问我父亲说：“你去不去？……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那时候，我父亲本不准备去北京的，但是他说：“那好，我去。”就这样，陪着他到了北京。龙云是很正派的一个人，后来给他的地位相当高，做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于军委副主席。我父亲作为教育界的特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政协。

1950年，有一次董必武请我父亲吃饭，说要安排他当云南省副省长。但那时候，我父亲什么都不愿意做，引《庄子》里的话，说：“日月出矣，而燭火不熄。”就是说，没我什么事了，你们那套我不懂，我的那套都过时了，只想做一个闲散的人。董老说：“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人都要有个组织。”最后让他做了国务院参事，并且要给他一座王府，被我父亲拒绝了。

那一年，我们举家搬到北京。汤用彤跟我父亲是很好的朋友，说：“既然你来了，一定要和我接邻而居。”汤家在小石作，那是很短的一条胡同，大概总共十三号，汤先生就一家家问，看谁家可以租。后来我们住进小石作二号，就在汤家的对门。但是家里人多，不够住，汤先生说：“我这儿有空房，到我这里来。”老先生、老太太住北屋，汤一介住西屋，我和我哥哥就常年住在东屋，还参加过汤一介和“黛子”（乐黛云）的婚礼。那次挺逗，来的人非常多，有人称赞他们，说：“一个是青年有为，一个是有为青年。”我们就搬个小板凳，坐那儿看热闹。

## 二

在香港时候，我上的岭南小学，那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有个老师叫刘慧娴，

当时在那儿教音乐，后来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第一任校长。她说我的音乐感觉很好，每到圣诞节，常常让我当领唱，后来就教我弹钢琴，分文不取。所以我学琴很早，大概六七岁就开始了。

搬到北京，我是在孔德小学读书。1951年，中央音乐学院办“少年班”，第一届是刘诗昆他们那班，小学四年级就可以去报考。有的人什么都不会，五线谱都不认识，但是乐感好，也考上了。父亲觉得我太小，不放心，等第二年我的一个舅舅到了天津，将来有人可以照顾了，这我才去考。那年我十二岁，刚好六年级毕业。

那一次，北京报名的有一千多人。先笔试，放一台也不知什么机器，比如两个音，问你哪一个音高。开始很简单，但音的距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比半音还小，就是要考你对音高的辨别能力。然后口试，黄飞立老师是我的考官，让我随便弹个什么。当时也没说拼命准备之类，都是有什么就弹什么。然后让我背过去听句子，然后是打节奏，他拿个打火机在钢琴上敲，让我重复。那次北京取了十七个，发榜一看，哟？有我。也没高兴，也没不高兴，这么就去了。

钢琴是我的主科，但进去没多久就发现，我不能学钢琴，为什么呢？因为刘诗昆是钢琴家。虽然这个人不怎么样，在有些事情上，他就是一个恶棍、是个流氓。而且，这个人对政治贼感兴趣，有着一颗莫名其妙的政治野心，但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文革时候就胡作非为。尽管如此，刘诗昆依然是个天才，很少见、很少见。上帝给了他一双极灵敏的耳朵、一双极好的手，几千万人里也找不出第二个。十七岁在匈牙利“李斯特比赛”上得了三等奖，赵汾就说：“多少年之后，匈牙利的教授们还对此愤愤不平。”因为一、二等奖是给苏联“老大哥”和匈牙利人的，三等奖才轮得到刘诗昆，为了补偿一下，还给他个“特别奖”。刘诗昆非常适合弹李斯特，因为它非常华丽，叽里咣啷、叽里咣啷，那东西对他不在话下。他的老师是海归，从巴黎音乐学院回来的，不过琴弹得并不好，一场音乐会都开不出来，法文大概也不怎么样。所以刘诗昆根本看不上他，平时不练琴，整天胡玩儿，但是他可以百发百中，不弹错音的。那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天才，让我一天练二十五个小时，一百年我也练不成刘诗昆。

但是，我的兴趣比较广泛，除了音乐，我也喜欢诗词歌赋、喜欢古典文学。三岁会背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



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另外我还喜欢历史，没事儿就到旧书店里乱翻。有一次翻到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就把那书买回来，后来知道叫《古文观止》。那篇文章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虽然有好多字不认识，但是我能感觉到文章之美。我还默写过《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那都是中学时背的，也只有那时候才记得住。什么乱七八糟文章我都看，凡是读得懂的都找来，像王若水，那是学界深入浅出的大师之一，我非常佩服他的文章。

1955年，附中成立了“理论学科”，老师说：“理论学科可以有现成的学生啊，李春光就是一个。”还有储望华，他是储安平的儿子，我们一直同班。当然他也没显摆，他爸爸再有名，也不是将军，也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部长，不过是一个知名的民主人士，最后无非就是《光明日报》总编，那算什么？包括郭沫若，许多老革命根本不把他放眼里：无非就是舞文弄墨，毛欣赏他，把地位抬得很高。中科院院长、文联主席算什么？我是军区司令，老子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你干吗呢？而且“南昌起义”以后你逃跑了，弄些甲骨文，甲骨文是什么东西？储安平也是，他是办《观察》出的名，但除了文化界，没几个人知道他。所以在“反右”之前，储望华丝毫没有一点儿名人子弟的优越感。

他是白丁进来的，人很聪明，也挺可爱，就是个子小。少年班有个规矩，第一年通通试读，不合适的，退回普通中学。储望华个子很小，手也很小，而且手是软的，立不起来，几次考虑要把他退了。但是他的音乐感觉又不错，犹豫来、犹豫去，一直到他附中毕业，钢琴也不是弹得很好。但是这个人很奇特，说：“你们别笑我的个子小，我过了十八岁才长呢，我哥哥就是这样。”果然，过了十八岁他就噌噌噌，一下蹿起来了，琴也越弹越好。

1957年“鸣放”，储安平说：现在大家只给“小和尚”提意见，但是我要给“大和尚”提意见。于是有了“党天下”的说法，说党控制了一切。储安平很悲惨，后来是大右派，新娶的年轻老婆也跟他离了，嫁给另外一个人，就住在他们家附近。所以储安平几乎天天看见，他所钟爱的年轻美人在人家的怀抱里。大概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那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文革时候，刘少奇都没人关心了，储安平已经是“死老虎”，谁管你？储望华对此也只字不提，而且那时候，他

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压力非常大，一定要表现得极为革命。所以后来他的许多行为，我都完全可以理解，也能够原谅。

1957年，那时储望华还小，对很多事不了解，也不知道轻重。但是到了1958年上大学，储望华想学作曲，不让他进，那就是当头一棒。因为作曲、指挥、理论，这三个系都是把政治条件放首位，第一条就是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家里有“关管杀”的都进不去。当时储望华的专业已经很好了，于是钢琴系把他招了，并且后来被留下来。作曲是他自学的，80年代开了作品音乐会，周广仁亲自上去给他弹。所以我就说：你们不要胡吹，老说“名师出高徒”，没有这回事。而且现在造成一个风气，音乐学院争抢学生，好的都到林耀基那儿去，不然你就接受点儿“困难户”。其实应该倒过来，“高徒出名师”，给你个榆木疙瘩，再大的本事也教不出来。

我和储望华比较要好，不过，我对他的批评也是直言不讳。我说：“你的聪明是万花筒式的、七巧板式的，我们拼不出来，这是你的聪明。但是你的音乐缺少热情，没有一个乐句、没有一个音可以拨动我的心弦。要知道，我并不是心中无弦的人。”平时我们就比较好，那次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也哭了、我也哭了。

### 三

我是1958年附中升本科，应该1963年毕业，但是大四时被派到朝鲜。经过四个月的语言培训，转到平壤音乐舞蹈大学，校长金元均，《金日成将军之歌》、朝鲜国歌就是他谱的曲。在那里，我见过五次金日成同志，见过无数次金正日“小子”。我那时候二十二三岁，他比我小两岁，是金日成大学的学生，老来找我们搭葛。至于为什么把我弄到朝鲜去，你愿意听吗？那我可以简单讲一讲。

中朝两国关系离奇曲折，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中苏论战，分歧越来越大。1960年，为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等，一共三篇文章，于是中苏关系尖锐起来。直到1963、64年，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九评”，达到“反修”的高潮。一开始，朝鲜人是骑墙的，后来基本倒向了苏联。但是朝鲜人的自尊心很强，赫鲁晓夫又比较愚蠢，对朝鲜指手画脚，不知怎么得罪了金日成。金日成一怒之下，不指名的批判苏

联，中国一下逮到机会了。1963年朝鲜国庆，《人民日报》以空前的规格，热烈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然后，两国大幅度增加文化交流，比如互派留学生，而且数目相等，表示平起平坐。在这样一个契机下，我被派到朝鲜。

在那里，有几件事情我的印象极其深刻，首先就是物资极其匮乏。作为留学生，我的伙食费一个月是一百多块钱朝鲜币，有个“阿妈妮”（老大娘）专门给我做饭，那就很高级了。但是在食堂，我看见学生吃什么、教师吃什么。第一，终年没有肉，第二，终年没有一滴油，只有一点点鱼干。朝鲜东、西海岸应该有很多渔场，但都变成军事设施，布满了鱼雷之类，根本不能捕鱼，所以老百姓吃鱼都很困难。商店里，苹果和大花生还比较多，但是没有糖果，没有饼干，那么小孩子吃什么？平壤气温跟北京差不多，夏天很热，加上它的那个沥青路质量不好，软得可以沾到你的脚后跟上。小孩子没的可吃，就把那个沥青抠出来，软软和和的，放在嘴里嚼，像吃橡皮糖似的。当然那一定不好吃，他也未必会吞下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任谁说，我也不会相信。

再比如，那儿有一个特供商店，上下两层楼，面积很小，专供外国人和高级干部买东西。其实无非就是日常要用的，钢笔、墨水、鞋油之类，但是要持特供的卡片，而且每个月有限额。金正日是没有额度的，后面跟一个尉官，随便什么东西，他用手一指，那个尉官就给夹着，我看见他的这种“表演”不止一次。

另外还有一点，包括后来我在美国，有一次跟他们闲聊，我说：“如果你们去北朝鲜住上一阵，你就会知道：相比之下，中国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天堂。”文革多好啊，可以给任何一个领导人贴大字报，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反，包括省委书记等等，你想反谁就反谁。对毛的个人崇拜，那跟朝鲜人对金日成，根本就不能比了。

比如他们那儿，人人家里都有收音机，但只有一个台，所以只有一个钮可以动，用来调音量的大小。特供商店里，有从中国、苏联进口的收音机，但在出厂之前，把所有频道都焊死。像什么短波、长波，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呢，人人都要戴像章。除了厕所、洗澡房，无一例外，所有、所有的地方都要挂金日成像，像佛龕似的供在那儿。我住一间单独的房子，他们也送来一张金日成

像，而且给我一个同样大小的镜框，让我找张毛主席像放里面。我说“没有”，他非常惊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再比如我的导师，那是很有学问的人，有一次问我：“听说在中国，什么戏种都可以演，这是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京剧、昆曲，还有秦腔、山西梆子等等，乱七八糟加一块儿，那得数以百计、数以千计。他特别羡慕，因为金日成对传统的东西，喜欢的他保留，不喜欢的就禁绝。比如潘索里，那类似中国的评弹、京韵大鼓，特别有味道。在苏联大百科全书里，专门有个条目讲一位潘索里艺人，把他捧为世界级的大师。但是，金日成不喜欢这东西，当面挖苦说：“我就讨厌你那个‘呜……’”他一讨厌不要紧，这位大师立刻被贬到北方严寒地区，在一个小道的歌舞团当了普通乐队队员。

课堂上举例子，我听过一点潘索里，不到一分钟，那简直太迷人了，就跟我导师说：“跟中国音乐比起来，大概只有苏州评弹可以跟它媲美，太有魅力了。”一句话说到他心里，跟我讲了上面这些，他当然对此愤愤不平。

#### 四

工作组走了以后，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先是保皇派当权，叫作“主义兵”，以附中小孩儿为主。其实，那就是一帮不大懂事的“红五类”，很多都是高干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女，拿鞭子抽人，毫不客气。但是这些人都比较尴尬，比如忽然某一天，啪，他爹被打倒了，他又“黑”了，所以“主义兵”的寿命不长。后来，渐渐有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我们这派叫“北京公社”，一共就三十几个人。不过我们很铁，始终都叫“北京公社”，不像“红岩”“战斗团”之类乱七八糟什么的，最后联合起来，叫作“1114纵队”。因为那天是11月14日（1967年），就起了这么个名儿，我们还讥笑他们，说是“要、要、要死纵队”。

我不是“北京公社”核心组的成员，从来没当过头儿，但他们说，我是“不是头儿的头儿”。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写上报材料，一般都是一式三份，总理一份，“江青同志”一份，康老一份。康生是大书家，可惜当时我没收藏一幅他的字。今天文物卖那么火，你要有幅康生的字，立刻就可以脱贫，呵呵。

那时常常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不时地有接见大专院校群众组织的代表，那是总理主持的，像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等，这些人我都

见过。1970年，有一次为各个文艺团体下放的事，专门开了这么一个会。总理说：“李春光来了吗？……你到前面来嘛。”为什么把我叫过去呢？因为在此之前，我为我的好朋友郑伯农绝食五天，这事闹得很大。郑伯农的父亲郑公盾是“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顶撞了江青被抓起来，一家子都受牵连。有一阵子，我们把郑伯农藏地下室、藏天花板上，直到工、军宣队来学校，这才不得不把人交出来。我替郑伯农鸣不平，结果把我也关了起来，于是就绝食。父亲写信给总理，最后是总理亲自过问，才把我放出来，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走到总理跟前，他问我多大了，我说三十岁。总理一秒钟的间隔都没有，立刻就说：“解放时候才上小学嘛，你是‘两门’干部。”过去有种说法叫“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直接进机关门。他说：“不过学校也算机关，你也就算‘三门’了。”接着又问我是学什么的，声乐，还是器乐？我说是学理论的，总理说：“哦？那你是理论家了，实践了没有？”我愣住了，答不出来，总理说：“理论，还要实践。”

我在总理面前站了四十分钟，单独谈话二十几分钟，中间有人吵吵要发言，总理说：“你不要打断，我跟他说几句嘛。”后来他跟旁的人说：“他们送来的材料，摞起来有这么高（按：用手比画，约一尺），我都仔细地看。”那都是我写的，比如像“孙、方、舒、危”，总理一定是有印象，说：“‘孙、方、舒、危’这四个人比较注意了，但是一定要把材料搞清楚。”原话就是这样，我一个字都不会记错。总理又问：“你们‘山’上一共多少个人？”我说三十几个，“一直没有下‘山’吗？没有参加他们的学习？”我说没有。总理说：“看来，你们两派影响都不大。”那时候“1114纵队”是多数派，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九十，但不能撼动一个小小的“北京公社”，一个人拉不下去，就跟“钉子户”似的。可惜我们也不能感动他们，没一个人投奔到这儿来，所以总理说了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两派都不能控制音乐学院的局面。

总理说：“文艺界难管，很复杂，谁也不愿意管，就让我来。我哪里管得了呢？想来想去，那就只有把你们送到部队去。”后面的话我记不住了，大意是：下去以后，劳动很辛苦，刚开始腰酸背痛，你们要慢慢适应；不要晒的漆黑、把身体搞坏了，以后回来还得搞你们的专业，该跳舞的跳舞，演戏的演戏。本来我们坚决反对下放，但总理讲得很诚恳、很体贴，非常的吸引你。后来又

说了一通，总理说：“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我立刻就说：“总理指示完全符合实际，非常正确，我们一定照总理指示办。”他说：“不要说‘指示’，我也不了解情况，什么时候一句话说错，又贴大字报了。……我们这些老头子，说话软趴趴的，不带劲。‘王关戚’说话带劲嘛，你们就喜欢听他们的话。”

记得总理还说：“你是李一平的儿子吗？你看，你家里我都晓得。……鲁迅的文件你读过吗，‘四条汉子’你知道不知道？”他不说“文章”，他说“文件”，这有一点奇怪。问我“四条汉子”，我说我知道，他皱了皱眉头，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说家里有一套《鲁迅全集》，我读过，他说：“那是因为你父亲有这方面的接触了，很多人不知道。”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希望我说“不知道”。那时候，工宣队正跟我们闹得很厉害，会上总理就拿我举例，说：“比如李春光吧，今年三十岁，解放时候他九岁，才上小学嘛，‘四条汉子’、文艺黑线跟他有什么关系？”

“北京公社”里有个叫云德海的，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在食堂里蹬三轮买菜，文革时，我们都叫他“云司令”。那次他也去了，并且要求发言，说：“工宣队根本就没做检讨！”总理说：“怎么会呢？”“那是假检讨！”总理说：“怎么会是‘假检讨’？他们两篇检讨的稿子，都是我看过的嘛。……年轻人，敢于提意见是好的，但也要懂得尊重领导。领导嘛，总是经验多一点，但是领导也会说错话。谁不说错话呢？不要抓住一句错话就没完没了。”他是两头做工作，后来一个工宣队的人站起来，总理忽然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四十六岁，“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总理说：“老工人、老党员，就要懂的爱护年轻同志。列宁说了，‘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是可以原谅的’嘛，不要说起话来就硬梆梆的。毛主席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录音，你们都听过吗？那是多么慈祥。”然后他立刻补充一句，我想他不是很由衷，说：“林副主席，也是这样嘛。”

那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中间总理要去处理文件，让大家休息一下，有的人就趴在桌子上睡起觉了。大概过了四五十分钟，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就说：“总理一天没有休息，明早九点钟还有个外事活动，我有一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待会儿总理出来，如果没有特别紧急重要的问题，可不可以就不要

主动提问了？”后来总理出来，大概已经过了十二点，他让大家继续提问。大家不吭气，总理说：“哦，刚才讲到‘二流堂’，这个事情我要继续把它讲完。否则，我们这些老头子死了，没有人能讲的清楚。”又讲了一通，关键一句话是：“这件事和郭老没有关系，不要扯到郭老身上去。”“二流堂”当时成为一个大案，吴祖光、黄苗子等等都成了右派。我看过黄苗子的亲笔交代，里面乌七八糟，各种低级下流的事儿都有。其实，“二流堂”这个名字就是郭沫若起的，怎么会和他没关系？

之后，总理又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还不吭气，于是总理就翻他手里的那份名单，开始主动提问。“中央歌舞团，你们那里跑了几个人，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再详细讲一讲。”那人很啰唆，讲了十几分钟，总理说：“你们现在一共关了多少人？”那时候抓“五一六”，都是隔离审查，他大概说是七十，具体我忘记了。总理说：“怎么会这么多呢？材料确实的有多少？”那人又说了一个数，总理反应很快，说：“哦，减少了一半，我还是不相信，不可能的嘛。”后来他又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提问，最后说：“把你们送下去，那是因为没有办法了。但下去以后，我不是不管你们了，有什么事情，你们还可以写信来嘛。”

就这样，谈到差不多快早上七点了，总理说：“还谈吗？……天都亮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就到这里吧，好不好？”于是就这样结束了。那是多么客气、多么和蔼，听着舒服极了，多少年都没有人这么跟我们说话。工宣队，那都凶得跟流氓一样，什么时候用过这种口气？

十天之后，我们就下放了。中央音乐学院分三个地方，其中部分师生、教职员到了清风店，被38军接管。38军很牛了，在全国野战军当中，是装备最好的一支机械化部队，说：“马克思有个助手是恩格斯，列宁有个助手是斯大林，历来都是这样。毛主席也有个助手，那就是林副主席，而38军就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铁军’。”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还教我们唱他们的军歌，直到林彪出事，那都是后话了。

下去以后，第一个月不干别的，下发总理发言的材料，叫作“五九指示”，让大家学。因为我是总理单独找去谈话的，材料上开头好几页大概都是这个。那我当然就成左派了，成为音乐学院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但他们没想到，我是

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脾气。毛主席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连着写了三份意见书，搞得他们很恼火。那个“二号”人物，是个团副政委，在大会上说：“我要提醒你啊，因为写意见书而犯错误的，大有人在。胡风不是写意见书吗？彭德怀不是写意见书吗？李春光就是音乐学院的胡风、彭德怀。”所以，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把我也揪出来了。

“五一六”确实有这么一个组织，叫作“五一六兵团”，我也搞不清是哪里的。北外有个“六一六”，也是公开贴大字报，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毛是造反派的首领，保皇派保的是走资派，他们认为，周是保皇派的黑帮老大，所以光明正大的反周。总理曾经有一句话，说：“那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我见‘六一六’的几个人，有几个的口才真是不错。我希望‘六一六’出几个人才。”要知道，那是反总理的一个组织，但是周希望，他们能出几个人才，我对这个的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后来，大规模的抓“五一六”，那就变成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凡是反总理的都是“五一六”分子。那38军最凶狠了，所有造反派都被打成“五一六”，没有一个漏网，也包括我在内。关了我一年多，说我“反军乱军”，于是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这很可笑，我怎么会反对总理？但是“县官不如现管”，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很晚才公布，所以那年没有“十一”游行，说是为了战备。那时候我还被关着，但我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发现“十一”那天的《人民日报》上没有毛主席像，也没有发社论，我就知道要有大事发生。后来又过了一阵，已经比较冷了，忽然下达通知，讲林彪事件。我属于被审查对象，比革命群众还要晚几天知道，但听了以后，我是一身的冷汗，毛骨悚然。

震惊，非常震惊，而且充满了恐惧，之后又带着一种茫然。林彪突然变成这样，可见中央上层的斗争有多么尖锐激烈，完全出乎你的想象。忽然我就有一种感觉，像我们这样的人，将来可能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从那时起，我对毛的信任度就大幅度的衰减了。后来又批林批孔什么的，越搞越荒唐，而且有人依然极其忠心耿耿地跟着江青跑，我就觉得不能原谅了。我们家跟汤家很熟，像汤一介，我们从小就住一块儿。但是1974年批林批孔，他还那么积极，到体育馆作报告之类。因为那些材料都是他编的，现在叫“国



学大师”了，但你就没有一点儿头脑，那批林批孔是干什么的？

## 五

1975年8月8日，我写了一篇大字报，后来被历史博物馆拿走了，给我一个复印件，现在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前几年有人把全文贴在网，叫“李春光1975大字报”，回头我可以传给你。

那时候，忽然传达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七二五批示”，那是一部关于大庆石油的电影，歌颂余秋里。不管怎么样，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把大庆油田搞起来，那就是丰功伟绩，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所以大家看得都很来劲。但是，歌颂余秋里就是歌颂刘少奇，江青不干了。文化部搞了个“十条”，把电影批得体无完肤，说是非同小可、不可等闲视之，等于这就是个反革命“毒草”。当然大家就很气了，编剧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信——其实他也不敢写，是贺龙的女儿贺捷生鼓动的，而且她神通广大，给送了上去。毛主席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当时我们正在首钢劳动，全给叫回来，在天桥剧场听传达毛主席指示，后面是文化部核心组的表态。回来以后，系里找间大课室，组织大家讨论，但是冷场，没有一个人发言。因为这是天大的事儿，谁也不知道背后到底是怎么样，既不鼓掌，也不交头接耳，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党支部书记说：“李春光发言，你带个头儿。”

当时我一听这个批示，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很震动。没想到毛会讲这个话，会支持一下人家对江青荒谬、霸道的反抗，这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了，根本没想到。党支部书记发话，我站起来，说：“凭什么让我带头？你怎么不带头？”后来有人要发言，是个积极分子，看风使舵、向上爬的那种。但是他的水平不高，不会看风，也不会使舵，愚蠢到还要拍文化部的马屁、抱江青的粗腿。他说：“听了文化部的表态，我很感动。从前毛主席有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中宣部、文化部根本不让我们知道，但这次不同了。毛主席批示才几天啊？立刻就传达了，直接传达到每个党员和非党群众，而且回来让讨论，征求大家意见。这，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之下、经过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文化部。”

本来我对这人就很看不起，他慷慨激昂说了这段话，我忍不住了，说：“我说两句吧。”这一说就不可收拾，前前后后大概有三四个小时，有无穷的话要

说，而且都说出来了。当时，我们每天的记录要上报文化部。那个记录员人很好，但是文化水平很低。关于我的记录一共两页半，我一看，哎呀，很重要的话他没记上，不重要的话写了一大堆，而且写的不清不楚、错白字连篇。党支部书记跟我比较要好，说让我看看，修改认可之后签字。于是我就写：“错漏甚多，李春光。”

后来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它写成大字报。回家之后，很快，简直是不假思索，哗——，就写下来了。我妈妈在旁边，我写一页，她看一页，然后就唉声叹气，说：“你真要贴啊？……哎呀，你真的要贴？”我说：“老太太，你呢，要是看着胆战心惊，就到外面散步去，我写完了再给你看。不贴的话，我写它干什么，我吃饱了撑的？你就别在这儿唉声叹气，我也没时间了。”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很快我就写好了，是一份详细提纲。

第二天清早，我到郑伯农那里去，正好他弟弟、他妈妈也在家，我就读给他们听，一边读、一边完善。郑伯农没有发表意见，他这人有时不大乐意吭气，可以跟你相坐两三个小时一言不发，我已经习惯了。他弟弟叫郑仲兵，过去是民族学院的群众领袖，知名度很高，他喜欢说话，说：“你不要这样胆大妄为。”于是我把他们骂了一通，转身就走。他弟弟还不善罢甘休，拍着我的肩膀说：“李春光啊，李春光，你读这稿子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但是你回去看看，你妈妈头上还有几根白头发呀。”意思是，你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你爹娘的安危。当时我很激动，说：“别来这套，你们是阻挡不了我的。”

回家以后，就在那个吃饭的大圆桌上，我让我的妹夫帮我抄。因为我写字很慢，而且比较难看，他的字比较好。就这样，我一边读，一边做增删、修改，他就在那里抄。

原稿后来扔掉了，因为那只是份提纲，而且写的乱七八糟，别人看不懂。然后，我的妹夫又照着那份大字报，复写了三份，算是留底儿。然后我就到学校贴去，围观的人非常多，一下子就传开了。中间曾经受过阻拦，因为我贴的比较矮，校党委书记让工人弄些沙子堆底下，所以下面一张有半拉都看不见了。但是一传十、十传百，拦也拦不住，很多外面的人跑去看，晚上还有打着手电筒去瞧的。据说李泽厚也去了，后来有一次见到李慎之，他说当时也跑去看。刘德海，那是琵琶大师了，《十面埋伏》就是他改编的。他家就住在对面的2

号楼，有一天下大雨，他们夫妇俩跑去看，发现没有一滴雨打在那张大字报上，刘德海还说：“天意呀，天意。”

2006年，香港出版了邓力群的自述《十二个春秋》，里面有一节就讲到李春光的大字报这件事。

邓力群的侄儿叫邓启元，在音乐学院学唱歌。回去跟他叔叔说，音乐学院有这么一张大字报，引起轰动，于是邓力群让他抄一份看看。那份大字报始终都没被覆盖，也没人敢公开扯下来，因为大字报属于“四大自由”之一，但是有人在那儿值班，一个字都不准抄。于是邓启元跑到我家，说是看看底稿，抄回去学习学习，之后经由邓力群，传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当时是那儿的头儿，他非常欣赏，打印出来，政研室人手一份，说是要“学习李春光的大字报”。据邓力群回忆，乔木说：“这样的文章，我是写不出来的。”后来，胡乔木把文章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立刻递给毛主席，毛批示说：“此件有用，暂存你处。”退还给了邓小平。

没过几个月批邓，工宣队的头儿不断找我谈话。那是个首钢的师傅，其实我们挺要好，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拍桌子、砸板凳，“砰”一摔门走了，天天都这样。比如他们老问：“你的后头是谁？”老想把我跟邓小平扯一起。但我后头谁也没有，我说：“我见过很多人，见过周总理，见过康生，也见过春桥同志、文元同志，还跟叶群同志谈过话，唯独没见过邓小平，让我交代什么？”而且我不做牵线木偶，什么时候说话、写文章都是独立的，不需要背后有任何人，所以很快就把我逮起来了。于会泳<sup>1</sup>召集专案组开了八次会，说：“我们知道，这个头很难剃，但是一定要剃。江青同志说了，李春光的大字报已经成为邓小平政变的材料。”这是后来于会泳被揭发，他自己说的。

关了我三个多月，不久毛死了，紧接着“四人帮”垮台，这才把我放出来。之后，《人民日报》要发这篇文章，找到我，问可不可以改，比如“主席”改成“毛主席”等等。我说大概不需要这样，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也没有权力去改任何一个字。他们还没发呢，新华社来了，最后是由他们发的通稿。

1976年12月，新华社发通稿《一篇讨伐“四人帮”的檄文》，所有报纸都在同一天发。所以后来我接到很多素不相识、从各个地方寄来的报纸，包括从

<sup>1</sup> 于会泳（1926—1977）：山东威海人，戏曲音乐家，197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次年隔离审查，服毒自尽。

四川一个小的县城，那是地区性的报纸，大家都在发这个东西，而且是头版头条。当天早上七点钟，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把新华社的通稿读了一遍，又把《人民日报》的短评读了一遍，恰恰半个小时。晚上在《新闻联播》又读一遍——当时没有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还是广播电台。一年以后，华主席在人大会堂接见，握着我的手，说：“李春光同志，你的文章写得好啊，你的反潮流精神好啊，值得我们学习。”

曹禺的女儿万昭和我附中的同班同学，开始时，她曾经从我这儿抄了一份，回来说：“哎呀，我爸爸天天读，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在屋里高声朗读李春光的大字报。”当时我不懂，真应该让他女儿录一下，那一定是稀世珍宝，因为他是很好的戏剧演员，对朗诵不是一般地在行。新华社在发通稿时，拿掉了一些具体人名，并且删了三个字，“总理的话，你们（指文化部）可以置若罔闻。总理指示，对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顶个屁！”他们大概觉得不文雅，把“顶个屁”给删掉了。曹禺就说：“他们不懂啊，这个地方就要这样，‘顶个屁’！”他很激动。

后来曹禺请我吃饭，说：“你的这篇文章，我正背如流、倒背如流。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就是这一篇。而且二十年内，不会有第二篇更好的文章，你自己也写不出来。”

## 六

1976年1月，总理去世。“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在西单，大家哭成一片，那真是感天动地。天安门布满了花圈，都是自发去悼念的人。那时候我们天天到天安门去，后来有了“四五运动”，那天我也去了，骑个自行车。不过那次还比不上“六四”，只是民兵拿着棍棒，从中山公园冲出来。广播里不断播送吴德的讲话，播送《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那歌儿，人们“哗——”就从广场往外跑，但是跑完就完了。

到了9月，毛去世。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追悼大会，那么隆重、那么宏大。但跟周的去世很不相同，完全是官方组织的，排成方块什么的，实际没那么多人悲痛他。10月6日，江青被抓起来，“四人帮”彻底倒台了。

从前我是又红又专，还被派出国，虽然写了十几年入党申请书，但始终入不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家觉得我应该是党员了，也让我参加“十一大”，

有人还提议，让我当“第一副院长”。但是现在，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始终我都不能写这个申请书。

我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想说的话，你打死我，我也要说；不想说的话，打死我，我也说不出来。刚开始文革时，我们是满怀热情，而且充满了希望。文革结束了，我们激动万分，觉得大快人心，以为社会终将走向科学、民主、法治。我们的思想都很简单，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绝对拥护党，绝对相信祖国的繁荣昌盛，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但是现在我知道，没这么简单，没想到“六四”邓小平会开枪，没想到贪污腐败如此盛行，没想到社会变成了今天这样。

我以为，中国的悲剧，就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叫作“官僚资本主义”。毛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相信这句话，但那必须是真实的社会主义。■

## 【文摘】

### 1978，真舍不得你走

#### ——党报旧闻与高层旧事

#### 祝华新

1978年6月，汪东兴副主席对胡耀邦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耀邦说：“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耀邦的这句话在党内未能传达，但人民日报把“两个不管”的精神塞进这一年11月15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

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决不能划一条杠杠：下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可以纠正；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文章刊出后，一个电话打进人民日报，开口就要求报社负责人接听。电话转到副总编辑李庄办公室，来电问道：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李庄回答：“我签发的，当然看过。”

来电话说：“你也是个老同志吧，你同意文章的观点吗？”

李庄说：“正因为我也算个老干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观点。”

来电提高了声调：“文章里说的‘领导干部’，包不包括毛主席？”

李庄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里自己也不甘示弱地提高声调回答：“你认为毛主席如果批错案子就不应该平反吗？”

来电突然挂断，显然是气坏了。

1978年，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陆定一，中共“七大”选出的三十几位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周恩来等人大学肄业），担任中宣部长20年之久。文革以来，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推翻，陆定一及长子陆德，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陆定一被批斗八九十次，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每次站五六个小时……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在绝境中，陆定一意识到要活下去，必须找到释放压力的办法。在秦城监狱的单身牢房里，他经常高唱京剧《空城记》、《甘露寺》，逼迫自己开怀大笑，虽然蹲了十几年监狱，却未失去说话的功能。悲愤难抑时，陆定一就大声嘶喊：“毛主席呀，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呀！”

秦川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

同志》，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里面有句话引起有些人的不满或担心：“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刊出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打来电话嘱咐：“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老部长这么写，秦川就敢这么登。在当时连林彪、“四人帮”所作所为“左”“右”属性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陆定一较早指出：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在党内老同志支持下，人民日报发出了反“左”的先声。

刘少奇平反后，少奇的儿子对秦川说：“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胡绩伟、秦川、王若水等人正是怀揣这样的忧患意识和豪迈抱负，带领人民日报，走过了疾风暴雨般的80年代，使得人民日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胡耀邦在前边冲锋陷阵，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几乎全部老干部方阵在后边支持，1978年掀起高潮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不仅为刘少奇、彭德怀、“61人叛徒集团”等党政军领导人洗冤，更有大量普普通通的党员和老百姓重见了天日：

——“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

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 1959 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 10402 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8 年至 1982 年底，全国共平反了 300 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 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一遍，这样做需要何等的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

曾被打成“右派”的诗人邵燕祥回望这个年代，无限感慨地说：“当时 20 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后来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不会像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能够在‘平反’这两个字后面读到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

文革后期受“四人帮”迫害的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说：这次中央全会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和法制，生命就会窒息，就会亡党亡国。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12月26日《人民日报》）

而老作家巴金从 1978 年岁末开始，在上海寓所沉静地写作《随想录》，在文革中失去爱妻萧珊的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严厉地解剖自己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

在整个国家清算历史的同时，体制内有识之士已经放眼世界向未来。

据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回忆文章（2008 年 12 月 25 日《北京日报》），1978 年五六月间，他率团访问西欧，为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和工商业发达而震惊。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回国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谷牧的汇报，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由华国锋主席主持，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都到了。谷牧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叶剑英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王震副总理后来访英，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私人住宅和小轿车，每年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感慨：我看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对东北地方负责人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邓小平强调，要“走出去”，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这就是没有1992年“南方谈话”有名的“北方谈话”，小平动情地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正如1978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豪迈地宣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这年岁末《人民日报》感慨：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人民敢提意见了，有话敢说了，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种局面。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国家遭

难，人民受苦。这样的历史不能重演了。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文摘】

## 关于“狼奶”教育的社会学想象

郭于华

“狼奶”一词的来龙去脉，难以考证明确。有人举例说见于刚打倒“四人帮”时，在报上看到一些老干部撰文，将文革中的红卫兵认定为“喝狼奶长大的一代”（范海辛“论狼奶”）。

较为近期的讨论始于关于历史教科书事件：2002年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撰写《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一文，痛切地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就此袁伟时认为，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袁文在2006年初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后，旋即导致“冰点”风波暴发，足见“狼奶”一事着实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同年，还是有关历史教科书，学者朱学勤就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表达肯定意见，指出：与原来的全国统编教材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是很大的进步。具体表现为：首先是在体系上，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朱学勤还特别指出：读这套历史书长大的小孩，我认为那真是喝人奶、不是喝“狼奶”长大了。（南都周刊朱学勤访谈）朱学勤的谈话再一次引发网络上关于“狼奶史观”的激烈争辩。

## 何为“狼奶”？

以“狼奶”表示某种意识形态内容与形式或许不一定全面、准确，但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概要性，它突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培养、教育功能和潜移默化但却影响至深甚至可以全面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的作用。一个人通过教育获取的知识、记忆的历史、习得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当然塑造其基本人格，这一过程比俗话说说的“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的表面环境还要内在和深入。当然这一教育形式就不限于教科书和学校教育了，它还可以是历史、文学、艺术、文件、政治宣传和仪式等诸多方式。

《半夜鸡叫》可以作为“狼奶”的典型例证。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大名鼎鼎的“四大地主”（另外三个是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之一的周扒皮之曾外孙孟令骞所撰作品《半夜鸡不叫》，全面分析并揭露了这一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让起码两代人耳熟能详、发行量达至500万册、全球阅读并选进了中国的小学课本、还被编成了动画片、成为阶级教育典型教材的出自《高玉宝》一书的《半夜鸡叫》是编造；《高玉宝》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也是假的。因为它的真实作者另有其人。孟令骞不甘于阶级斗争思维下可怕的政治帽子带给家族的屈辱，要为自己的先人“翻案”，而他所理解的“翻案”就是还原事实，因为“没有什么比事实更重要”。他花费5年时间，实地走访调查，采访当事人，用心血写成家族史《半夜鸡不叫》，还原了历史和人物的真相：

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文盲作家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而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凑合”而成的产品。

从《半夜鸡叫》到《半夜鸡不叫》，至少可以让我们有三个方面的思索：

根据常识，鸡在半夜里不会叫，这是所有在中国农村居住过的人都知道的。

基于现实，地主钻鸡窝叫长工早起干活简直匪夷所思：鸡窝那么脏，半夜起来又那么辛苦，黑了心的地主干嘛不直接把长工打起来下地？何必绕那么大

一个弯子？设想一下，黑灯瞎火地下地干活，不怕把庄稼苗锄错了吗？

对这个讲述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故事，人们并没有去想是不是合乎逻辑，并没有追问一下其真伪虚实。其实，这正是“狼奶”灌输产生的效果。简而言之，我以为，以欺骗方式制造的、以强制方式推行的、以灌输方式传播的全部统治意识形态都是“狼奶”。其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历史、文学、艺术、教科书、文件、宣传、政治仪式（如开大会、标语、口号、语录，阿里郎什么的）。其突出特点一是不顾事实，二是违背常识；有鉴于此，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我们其实是可以识别和拒绝狼奶的。

### 凶残——狼奶的本质特点

狼奶含有凶残、嗜血、横暴而又狡诈的毒素，因而久喝“狼奶”会具有狼性（其实是人性之恶）。表现在人类社会，“狼奶”所培育的首先是仇恨。仇恨这种情愫泯灭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理性，丧失所有的爱心、怜悯、慈悲和正义感，将所有对手视作死敌，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视为“其乐无穷”的事；权势需要时甚至可以将同志同伴置于死地。

仇恨所导致的行为一定是暴力；过度的残忍，不必要地使用暴力，必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种暴力可以说是人类所特有的，因为动物的杀戮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只有人类会以杀戮动物甚或同类为目的，因嗜血而产生快感。

仇恨和暴力至上当然不会懂得 *Living and Let living* 的道理，因而决不懂得沟通、协商、妥协和让步，不会博弈；也决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而只会强调你死我活，把暴力斗争推演到极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和我们知道的种种极端暴力均属此类。

就此而言，老干部把文革中的红卫兵称作“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是有道理的，他们将上述凶残特性发挥到极端。他们崇拜强权统治，酷爱阶级斗争，要打倒和铲除几乎所有人类文明成果和真善美的东西，甚至可以下手打死自己的老师、同学，与父母家人划清界线……。当然，这些凶残和暴力的源头并不在这些“喝狼奶”的红卫兵，而在于“狼奶”和狼奶的制造者。

### 欺骗——狼奶的制造过程

前文所述《半夜鸡叫》故事的产生就是狼奶的制造过程。现已得知，“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开始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上去。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进行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

乔治·奥威尔的杰作《一九八四》寓言式地描述了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的“狼奶”制造方式：在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设有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而主人公所在记录司的主要工作就是涂改记录、伪造历史、删除记忆。这一社会的控制者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

谎言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的情形在许多社会中发生过，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奥威尔揭示了历史与权力的关系：，“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涂改记录、虚构历史、删除记忆，是狼奶最基本的生产机制。

## 强制——狼奶的灌输方式

狼奶生产出来是为了让人喝下去，但这一接受过程不能允许让受众有所选择，因而只能采取强行灌输的方式。没有选择于是就只允许存在一种声音，只能用一个脑袋来思考，强调思想的统一、行动的统一、心灵的统一，“全国山河一片红”；所有一元以外的多元、同一以外的差异都视为异端邪说、阶级异己，为必在消除之列。

没有选择当然就不会有比较、有思考、有质疑，只能相信谎言是真实的，而且是绝对真理。于是就形成奥威尔所描述的“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而参与伪造者“一方面你必须意识到你自己在伪造记录，另一方面，你必须忘记自己在进行伪造，必须将伪造看作是真实发生的，这样的伪造才是真实的。因此，必须在伪造的同时忘掉伪造，这个过程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就有犯罪的感觉”。

灌输的主要方式是一种 Propaganda，而且常常是先声夺人、不由分说、不容质疑和气势凶猛的 Propaganda，从而达到一种裹胁群众的功效。

奥威尔几乎天才地预言了灌输绝对真理所达到的效果：“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東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

以欺骗、蒙蔽和强制方式制造和灌输狼奶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久而久之必定使喝狼奶长大的失去善良品性，崇拜强权和暴力，认同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主张极端民族主义等等，而且导致是非不明、好歹不分、思维混乱、头脑僵硬。最糟糕的是丧失现实感、常识性和辨识能力。喝狼奶当作母乳，饮鸩毒以为甘露，一个以狼奶为精神食粮的民族必将背离文明、进步的主流，否认人类普世价值而蹈入万劫不复之地。只有揭露狼奶、识别狼奶，

断狼奶而换以人食，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有健全头脑和心灵，具备作为公民的常识与现实感，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让我们为断狼奶而努力。☛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着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mailto: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mailto: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



